臺大歷史學報第 70 期
2022 年 12 月，頁 167-244

BIBLID1012-8514(2022)70pp.167-244
2022.4.6 收稿，2022.12.28 通過刊登
DOI: 10.6253/ntuhistory.202212_(70).0004

文化冷戰——香港中文大學的成立

陳 學 然*

提 要

港英政府合併三所中文私立專上學院為香港中文大學，既是回應社會訴求，也是為了加強社會管治與經濟發展需求。港府雖然主導中大的成立過程，但從新大學的構思、籌組、命名，到校長招聘、機構設置、人員聘用，乃至校園建築物規劃，美國的基金會都發揮了不容忽視的影響力。這是由於三所成員書院自創校以來便與美國深有淵源，致使美國的影響力在新大學的籌辦過程中延續下來。另一方面，在首任校長李卓敏帶領下，新大學的學科領域在為香港建立本土經濟建設模式之餘，更強調以美國為中心的國際化色彩。本文顯示，美國在香港縱然有意識地避免與中國武力衝突，但為了圍堵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則更著意在文教領域建立親西方的思想價值觀。以美國的文化冷戰策略及對華政策為視角，可見中大被塑造成一座對照民主世界與共產中國的文化地標。香港也被視作窺探共產中國的前哨站，成為美國文化冷戰中心與情報中心，反映了複雜的社會政治氛圍。相關探討有助於觀察戰後香港高等教育發展的歷史脈絡，加深了解英美在香港高教現代化過程中扮演的角色；當然，也有助於理解香港社會文化的獨特性。

關鍵詞：中文大學　冷戰香港　美國基金會　私立專上院校

*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副教授
香港九龍塘達之路 83 號；E-mail: hokychan@cityu.edu.hk

臺灣人文與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言：美國的冷戰政策與香港
一、美國對香港私專的援助與影響
二、從發展私專到建立中文大學
三、選拔中大首任校長的美國因素
四、以國際化為名的「美國化」大學
五、首批中大校園建築規劃的美國因素
六、各行其是：民族主義、殖民管治與文化冷戰
結　語

前言：美國的冷戰政策與香港

戰後美國勢力在香港盤根錯節，深入社會各個領域；外派香港的美方人員編制十分龐大。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下設行政處、政治處、經濟處、領事處、美國陸軍、空軍和海軍聯絡處等諸多部門，規模勝過駐莫斯科大使館，故被論者形容是「一個縮小的華盛頓出現在不是美國領土的地方——香港」。[1]戰後出任香港第 22 任總督（1947-1957 在任）的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 1899-1978）指出：「美國總領事館在香港的人員總數較該國在世界其他各地任何一間領事館的人員還要多。……香港的總領事館是美國在遠東許許多多機構的地區總部，也包括消息發放的機構。」葛量洪不諱言，北京政府反對英國讓香港成為「美帝國主義的基地」，把英國斥為「美國的走狗」。[2]正如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評估的，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是美國掌握「共產中

1 《大公報》，1958 年 1 月 12 日；《文匯報》，1958 年 1 月 4 日，轉引自葉霖，《在中國的影子下：美國對香港的外交政策 1945-1972》（香港：中華書局，2018），頁 135。

2 葛量洪著，曾景安譯，《葛量洪回憶錄》（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4），頁 215。（本書英文版：Grantham, Alexander. *Via Ports: From Hong Kong to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國」（Communist China）經濟、政治與軍事最為重要的資訊來源。[3]

美國早於 1950 年代初期便進行各種窺探「共產中國」的情報活動。諸如將在港反共人士轉移至海外；[4]透過在港建立的情報網絡，分析中共的政治動向；[5]借助香港警方，評估共黨人數及其在港活動可能引發的政治危機，不一而足。[6]相反，英國在二戰後綜合國力下降，加上 1950 年代中期疲於應付中東危機，遂對遠東軍事鞭長莫及。英國在港皇家海軍船塢也因為財政壓力，擾攘兩年多後，終在 1959 年關閉，駐軍人數大幅削減。此舉讓在港英人產生「英國全面撤出香港的先聲」的焦慮，導致社會人心不安。[7]

早於 1950 年 12 月 18 日，美國陸軍部助理參謀長韋克林（John Weckerling, 1896-1989, 掌管情報調查）指出，英國在亞洲可供集結的軍、警少於 2 萬人，根本沒有能力抗禦分布在香港周邊的 3 萬共軍，更何況華南、海南一帶還駐守逾 455,000 名可快速調動圍封香港的解放軍。[8]這說明如英國要維護其遠東利益，便要借助美國於亞洲的龐大軍隊和政治勢力以作屏障。英國期盼，萬一解放軍大規模襲港時，美軍第七艦隊以及駐紮在臺灣、菲律賓基地和沖繩的龐大空軍能夠提供援助。英方希望美國了解，相關軍事援助與其說是保衛英國殖民地，毋寧「為了

3 NSC Report 6007 on U.S. policy toward Hong Kong, May 9, 1960, p.15; Paper regarding U.S. policy toward Hong Kong, June 11, 1960, Supersedes NSC 5717. CK2349113632. 本文引用的美國檔案部分來自電子資料庫 *Gale Primary Sources U.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 CK2349113632 為該資料庫的檔案編號。

4 State Department, Mr. Clubb's Memo of January 25 on 250 Qualified Chinese in Hong Kong (Top Secret), January 27, 1951, 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in Washington, DC (以下簡寫為 NARA).

5 State Department, Transmittal of a Proposal to Establish an Anti-Communist, American Directed Intelligence Organization for China (Secret), May 27, 1950, NARA.

6 State Department,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Strength in Hong Kong, and Related Matters, September 27, 1951, NARA.

7 葛量洪，《葛量洪回憶錄》，頁 245-246。

8 US Army, Hong Kong (Secret), December 18, 1950, NARA FOI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美國政府的政策——在於阻止中國共產黨人伸向東南亞」。[9]

由上，為了借助美國的亞洲太平洋軍事部署，化解中國大陸對香港防務的威脅，英方在不少地方需仰美國鼻息。譬如，英國欲開通香港與廣東的航空航線，必須先向美國申請。如美國反對意見強烈，英方只能遵從美國協議而作罷。[10]不過，美國內部卻另有看法。一旦北京武力解放香港，美國不會軍事抵擋；但只要未發生這種極端狀況，美國樂見香港在英國管治下繼續成為一個獨立的自由港，這才最符合美國在亞洲的利益。直至 1967 年「六七暴動」爆發前後，美國對港政策仍強調維持冷戰初期的作法，貫徹以下五大目標：

1. 確保英國對香港的管治權，否則會為美國與中國、東亞的關係帶來不良影響。
2. 維護香港繼續成為獨立的經濟實體。
3. 維持香港的出口管制及嚴禁與中共貿易，同時擴展美國出口至香港以及經香港擴充至亞洲其他地方。
4. 繼續以香港為搜集「共產中國」情報的據點。
5. 保持香港為美軍艦隊的港口以及美軍在遠東部隊的休整地域。[11]

上述五點是 1950 年代初期東西方局勢不明朗且冷戰氣氛凝重的時勢下，美國所制定的對港措施，顯示美國對港不負防衛責任，最多採取積極的自我保護。美國國務院（The Department of State）、國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以及國家

9 葛量洪，《葛量洪回憶錄》，頁 217。

10 United States Aviation Problem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 September 23, 1955, CK 2349598727. 這是一份由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轄下遠東事務局公共事務主任麥卡錫（Richard M. McCarthy）及文化事務主任里德（W. Wolf Reade）擬寫，提供副國務卿胡佛（Herbert Charles Hoover, 1903-1969）、國際合作總署（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執行軍事以外所有外交事務）署長霍利斯特（John Hollister, 1890-1979）訪港前的官方參閱文件。

11 Contingency Planning for Hong Kong,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1967, CK 2349396275. 中譯為筆者自譯，下同。

臺灣人學術期刊資料庫

安全委員會根據 1954 年 4 月 30 日制定的《當前國家安全政策實施至 1953 年評估報告》，以不同形式先後頒布了《香港政策草案》（Draft statement of U.S. policy on Hong Kong, 1957）、《政軍緊急應變方案》（Political-military contingency study of Hong Kong, 1967）、《香港緊急應變方案》（Contingency Planning for Hong Kong, 1967）。從這些報告書可以看到美國的計畫是一旦共軍犯境，便立即對逾 6,000 名在港工作人員及每年約 1,500 名美國遊客展開「緊急疏散方案」（Emergency and Evacuation Plan），務必在 48 小時內完成撤僑行動，並不會積極作出軍事抵抗。[12]

至 1960 年，美國當局延續不願軍事介入香港與共軍抗衡的政策。相關原因，可總結為以下三點：

第一，英、中在香港周邊的軍事實力懸殊。面對圍繞香港邊境、具備海陸空武備配置的 6 萬共軍，人數不過 9,000 的駐港英軍在毫無天險可守的香港，難作任何有效防禦，遠在臺灣、沖繩及馬尼拉的美軍部隊更難及時馳援。

第二，英國不會為了守護香港而與中國開戰；美國也只會在安全的情況下充分利用香港，無意與中國大動干戈。

第三，美國白宮預算局（Bureau of the Budget）不願為香港編列任何軍費預算。時任總統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 1890-1969, 1953-1961 在任）指出，當毗鄰的古巴發生內戰，美國也沒派遣軍隊干預，遑論遠在亞洲的香港。[13]

職是之故，美國對港政策，是盡可能將香港建立為自由世界的前哨站

12 Draft statement of U.S. policy on Hong Kong,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July 17, 1957, CK 2349396275; NSC Report 6007 on U. S. policy toward Hong Kong, May 9, 1960, pp. 20-22; Political-military contingency study of Hong Kong, U. S. White House, 1967, CK 2349110590.

13 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447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held on June 8, 1960,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9/d33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Free World Outpost），用以展示西方文化價值優越面的窗口（Show Window），同時將之看作接收難民的天堂（Refugee Heaven），以及資源、貨物的集散中心。[14]

美國從 1954 年至 1967 年間多番檢視對港政策，由始至終最為關心的，是維護香港的自由港地位，以便充分利用香港並突顯其示範作用：「盡一切努力揭露共產中國的嚴密監控與苦痛，作為香港幸福生活條件的對比。」[15]如此一來，香港被美國定位為窺探中國經濟及政治的前沿戰線，是面向海外華人重要的文化及情報中心（an important cultural and information center for the overseas Chinese），[16]也是各種情報、政治機構的辦公據點，成為文化宣傳戰的主要陣地，替美國冷戰反共策略服務。

美國如何看待香港，葛量洪與英國當局亦有所了解，故不敢對美國參與香港防務抱太高期望。英方希望美國軍艦能經常穿梭於香港海域，發揮協同英軍防衛香港的功效。葛量洪為了釋除美國人有關香港是韓戰期間共產中國軍備物資走私天堂的指控，並增加美國對香港的興趣，他在 1954 年訪問美國時，有意投美國政壇之所好，公開宣揚香港是「東方的柏林」（the Berlin of the East）和「自由的堡壘」（bastion of freedom）。[17]他將

14 Draft statement of U.S. policy on Hong Kong, p. 7; NSC Report 6007/1 on U.S. policy toward Hong Kong 1960, June 11, 1960, CK 2349113667.

15 原文是：“Make every effort to exploit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regimentation and hardship in Communist China and the conditions of relative well-being in Hong Kong.” NSC Report 6007 on U.S. policy toward Hong Kong, May 9, 1960, p. 4; Paper regarding U.S. policy toward Hong Kong, June 11, 1960.

16 NSC Report 6007 on U.S. policy toward Hong Kong, May 9, 1960, p. 15; Paper regarding U.S. policy toward Hong Kong, June 11, 1960.

17 葛量洪，《葛量洪回憶錄》，頁 216。美國駐中國大使館於 1950 年關閉後，駐港總領事館的工作範圍隨即擴大，中情局香港站亦擴大規模，附屬在總領事館內，以之為掩護，展開各種政治情報蒐集活動。曾任中情局局長的科爾比（William Colby, 1920-1996）便把當時的香港與柏林看作美國的主要情報中心。參見麥志坤著，林立偉譯，《冷戰與香港：英美關係 1949-1957》（香港：中華書局，2018），頁 37-38。有關葛量洪如何陳述其「東方柏林」部分的冷戰論調，及其於教育領域的反共主張，另見陳學然、張志翔，〈冷戰時期香港「教育條例」修訂與私立專上院校發展（1948-1958）〉，《思與言》第

香港定位為亞洲的冷戰最前線與反共前哨，呼籲美國調遣第七艦隊和駐紮在臺灣、菲律賓與沖繩的美國空軍協助防衛香港。[18]葛量洪強調協防香港不僅僅保衛一個殖民地，更是為了實現美國防止中國共產主義向東南亞擴散的戰略。他視香港為展示西方民主的「窗戶」與「例子」（showcase of democracy）、「收聽站」（listening post），[19]讓中國民眾在此接觸西方的自由世界，讓他們把西方資訊帶回國內，以影響政局。[20]在此情境下，港府也為美國在香港的文化藝術、教育、傳播媒體或出版行業等領域中進行諸多帶有政治意味的活動，打開了方便之門。

葛量洪揭示英國面臨美中交鋒的窘局時所引發的危機感。一方面，英方需要美國軍政作為治港後盾，故處處與美國配合；但是，過度依賴美國防衛及經濟投入，難免讓美國介入香港事務，招引中共的不滿，增加香港政局的不穩定性。職是之故，英方又不得不警惕美方，甚至對美國某些「顛覆北京的秘密政策」感到恐懼。[21]但港府乃至英國政府，均如歐洲各國般，於戰後社會及經濟重建時需要美國援助。隨著英國的弱勢以及國力下降，戰後香港社會的重建工作更是處處捉襟見肘。香港於 1949 至 1952 年的短短數年間，人口驟增多逾百萬，造成房屋、醫療、交通、就業以至各級教育領域，都產生極為棘手的社會管治問題。[22]

近年不少關注香港冷戰時局的研究相繼面世。羅伯茲（Priscilla

57 卷第 4 期（2019 年 12 月，臺北），頁 150-155、166-167。

18 葛量洪，《葛量洪回憶錄》，頁 217。

19 “Sir Alexander’s Views on Hong Kong,” 30 April 1958,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Formosa (Taiwan) and Hong Kong, FO 371/133512, Record of Foreign Office,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英國國家案館, 以下簡稱 NA).

20 〈港督葛量洪在芝加哥演講稱：香港有兩重價值　竹幕來人可自此見自由世界〉，《工商晚報》（香港），1954 年 10 月 16 日，頁 1。

21 Substance of Discussions of State-Joint Chiefs of Staff Meeting, State Department (Top Secret), April 4, 1951, NARA.

22 Alexander Grantham, Hong Kong: Relations with China: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22 December 1954),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Hong Kong, NA, FO 371/11506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Roberts）與高馬可（John M. Carroll）編輯的《冷戰下的香港》（*Hong Kong in the Cold War*）共收入 10 篇論文，內容涉及美國在港基金會、情報及宣傳機構、冷戰與文化產業、冷戰與經濟發展、美國援助中國知識分子協會（援知會）、美國冷戰政治與香港旅遊產業等。該論文集是香港冷戰研究領域的里程碑著作，展示 1950 年代的香港在國際大變局下極其複雜的文化空間。[23] 2018 年，麥志坤（Chi-Kwan Mark）的冷戰研究譯成中文出版，[24]指出 1950 年代的香港在中、英、美大國政治夾縫中生存的脆弱性。香港之於美國，有利於蒐集情報、執行秘密行動，但這一定位正是英國引以為懼之處，擔憂它將會成為中美大戰之結穴所在。故此，英國在利用美國提供保護之餘，不得不約束「美國對華政策中過於咄咄逼人的傾向」。[25]由此可見，香港無疑是微妙及多元的，牽動著不同政治勢力的敏感神經。

羅永生《思想香港》的其中一章，從韓戰的視角論及香港的冷戰文化。他提出「英美聯盟，各懷心事」的論題，指出英美雙方表面上維持同盟關係與戰略共謀，實質上卻是各為其利而虛與委蛇，致使香港從未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東方柏林」。基於這種理解，羅永生認為美國雖然在香港投放大量資源，但不能高估美國對港冷戰策略中的反共成績。[26]

本文無意高估美國對港冷戰政策的成效，亦無意對香港的知識群體及教育機構作出任何泛政治化的解讀。然而，美國在港反共戰略或未取得預期中的勝利，但它自 1950 年以來源源不絕地對港投放大量經費，劍

23 Priscilla Roberts and John M. Carroll, eds., *Hong Kong in the Cold Wa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24 麥志坤的英文原著見 Chi-Kwan Mark, *Hong Kong and the Cold War: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4).

25 麥志坤著，林立偉譯，《冷戰與香港》，頁 2。

26 羅永生認為美國反共成效不彰的原因有四：一、美國無法禁絕共產主義在香港文教或媒體中的傳播；二、英國的殖民專權統治與美式冷戰的自由世界思維仍有極大差距；三、反共人士在民族主義分歧下，於香港延續國共相爭，異於美蘇間的意識形態之爭；四、美國難於國民黨以外找到完全配合其冷戰策略的反共力量，國民黨在香港亦難以團結所有反共力量。參見羅永生，《思想香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20），頁 29-46。

及履及地實踐文化冷戰政策——對香港文化發展、專上教育、社會救濟、國際文化交流與經濟發展諸方面產生的影響力以及所扮演的角色，絕對是不容低估或忽略，十分值得仔細探研。

針對戰後香港的教育問題，已有不少專門研究。周正偉便曾討論香港百年專上教育發展史的來龍去脈，當中包括戰後南來人士籌建的私立專上院校、私專因應「港臺」之間的衝突而催生香港中文大學（中大）的箇中原因。他也著力探究一些未被官方合併的私專，如珠海書院、香江書院等的後續發展景況與社會貢獻。[27]黃庭康的研究也有不少涉及香港私專院校發展問題。他比較戰後香港與新加坡的華文教育，從英國向兩岸政府或國共兩黨競爭管治霸權的角度，談論中大成立的原因，很具參考價值。[28]

至於專門從冷戰角度，尤其是美國的基金會藉各種經費協助在港私專文教發展的著述，也為數不少。周愛靈詳細論述新亞書院獲得美國的基金會補助而發展的始末，為我們揭示冷戰時期香港文教場域如何展現美國官方意識形態與反共主義。[29]不過，周愛靈主要論述中文大學成立前新亞書院的課程設計及制度發展；併入中文大學後的新亞書院或中文大學並非其關注重心。張楊致力探究美國發動的「文化冷戰」，近年連續出版兩部專書，[30]其中涉及香港的內容較少，但有一篇專研亞洲基金會如何推動香港私專成為中文大學的論文，相當值得參考。她的研究主要集中於 1950 年代中後期私專如何組成「香港中文專上學校協會」，並未觸及 1960 年代初期以來籌設中大的經過與冷戰下的美國因素。[31]此外，王

27 周正偉，《中國變局與香港專上教育》（臺北：政大出版社，2020），頁 131-215。

28 黃庭康，《比較霸權：戰後新加坡及香港的華文學校政治》（臺北：群學出版社，2008）。

29 周愛靈著，羅美嫻譯，《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香港：商務印書館，2010），頁 76-111。

30 張楊，《冷戰與學術：美國的中國學（1949-197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張楊，《文化冷戰：美國的青年領袖項目（1947-1989）》（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

31 張楊，〈亞洲基金會：香港中文大學創建背後的美國推手〉，《當代中國史研究》第 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梅香關注美國基金會在冷戰時代的環球活動，特別是從較寬廣的視野論述亞洲基金會如何援助包括香港在內的文化機構，以及美國冷戰策略如何透過亞洲基金會加以實踐的底蘊。[32]中文大學同樣也不是其研究核心。

結合冷戰視野而又涉及中文大學成立的，目前可見於韓墨松（Peter E. Hamilton）研究香港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的新作，部分內容涉及中大三所成員書院組合成中文大學的過程。該書突顯了李卓敏（1912-1991）作為「跨商」（straddling merchants）的本領，以及香港的戰後都市定位與中大成立的關係。[33]他的著作不乏洞見，並指出一個十分重要而過去為人忽略的問題——李卓敏與中大的創辦，是美國影響下的結果。李卓敏成為他筆下具備靈活應變、務實而適應力強之「跨商」特質的香港外來菁英，因而獲得校長提名，並在上任後將中大發展為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大學」（Transpacific University）。[34]不過，作者坦言並無進一步資料可細查李卓敏出任中大校長的原因。[35]本文撰述的目的之一，便是要補正這個香港教育史乃至中英美冷戰史長期以來的研究空白。

綜合學界目前的研究成果，我們可以看到戰後香港的私專教育是一個重要課題，近年陸續出版了不少可觀的著作。不過，美國的基金會如何介入冷戰香港的高等教育史，它們扮演何種角色、發揮何種功用、具體成效如何等問題，仍有待深入研究。同時，私專合併為中大後，面臨諸多內外挑戰，必須在各種夾縫中掙扎求存，也讓我們窺見英國殖民政權與美國、兩岸政權爭奪香港高等教育權的一端。基本上，中大從籌建

卷第 2 期（2015 年 3 月，北京），頁 91-102。

32 王梅香，〈冷戰時期非政府組織的中介與介入：自由亞洲協會、亞洲基金會的東南亞文化宣傳（1951-1959）〉，《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32 卷第 1 期（2020 年 3 月，臺北），頁 123-158。

33 Peter E. Hamilton, “The Turning Point: Li Choh-ming and Kuashang Strategies at Chinese University,” in *Made in Hong Kong: Transpacific Networks and a New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 99-126.

34 Peter E. Hamilton, “Decolonization by Investment: American Social and Financial Capital in Hong Kong,” in *Made in Hong Kong*, pp. 127-157.

35 Hamilton, “Decolonization by Investment,” p. 139.

臺灣人文與社會期刊資料庫

到發展，與時局的急劇變遷有莫大關係，相關課題仍值得我們系統而深細地研究，以補學界目前研究之不足。

一、美國對香港私專的援助與影響

（一）1950 年代的香港私專與美援

正如上言，於 1949 至 1952 年間，大陸來港難民驟然增加百萬；二戰中敗給日本的英國殖民地政權，在香港重光後，得力於美國的支持，加之蔣介石（1887-1975）的默許，得以繼續於香港執政。然而，重回香港的英國政權，在百廢待興之際，無力為各級學校的適齡學生提供應有的教育機會與權益。以高等教育為例，缺乏財政經費及社會規劃的香港政府一直鮮有資助，更不曾正視 1949 年以來 30 多所私立中文院校的發展，及其對於南來青年教育的貢獻。[36]直至 1956 年「雙十暴動」後，[37]港府才委任供職於教育司署的前私專教員錢清廉，調查 10 所辦學最成功的私專情況。

1956 年，當 10 所私專招生高達 2,443 名時，香港大學每年仍只招收 316 名，三年制課程的在讀總人數也只有 905 名。[38]當時較著名的私專，有新亞書院（1949 成立）、珠海書院（1949）、廣大書院（1949）、香江書院（1949）、光夏書院（1949）、華僑書院（1949 年復校；前身為 1938 年創於香港的華僑工商學院）、文化書院（1949）、廣僑書院（1952）；後四校與平正會計專科學校於 1956 年合併成「聯合書院」。[39]後來創辦

36 陳樹桓，〈香港教育的前途〉，收入胡般編，《香港現行教育法規條例彙編》（香港：星島日報，1959），頁 46。

37 1956 年國民黨在港勢力發動「雙十暴動」，造成逾千人傷亡及被捕。

38 “Report on Hong Kong Private Chinese Post-Secondary Institutions,” in Hong Kong Miscellaneous paper 1946-1957, For Sir Christopher Cox’s Information, 24 May 1957, NA, CO 1045/73, pp. 1-2.

39 相關書院括號內為其創校年份。參〈港臺大專學校簡介〉，《大學生活》第 2 卷第 3 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而屹立至今的，還有浸會書院（1956）、嶺南書院（1967）與樹仁書院（1971）。這些私專為戰後香港高等教育作出了巨大貢獻。

美國當局注意到這些私專作為「流亡大學」、「難民大學」（refugee university）的政治意義，有意給予援助，以改善辦學條件，讓華人可在港直接升讀大學，目的就是避免他們重投「共產中國」懷抱。美國國務院官員指出較具規模的七所私專正在努力掙扎求存，如果能有多些經費資助它們，將會是恰逢其時的大好機會（an excellent opportunity）。[40]美國政府當時從總統緊急國際救援基金中，撥出款項救濟香港的「知識難民」（refugee intellectuals）以及教育交流項目，當中便包括對私專院校的援助資金。一些美國基金會也投放不少資源支持它們的發展，並在推動港府成立第二所大學的過程中不遺餘力。[41]這些對於香港專上院校的大力援助，與美國在實踐文化冷戰計畫時，將之視作意識形態爭奪戰的重心有關。教育場域向來是針對年輕一代的各種文化戰、宣傳戰、心理戰之核心，是在港各派勢力的兵家必爭之地，也是意識形態的主戰場。

艾森豪總統把冷戰直接視作心理戰，故無論是文化冷戰、文化宣傳戰或心理戰，都是名異實同的意識形態戰爭，旨在與國際共產集團爭取人的思想、改變人的意志，在軍事、經濟、資源以外發揮更為微妙、廣

（1956 年 7 月，香港），頁 57-58；吳倫霓霞，〈建校的歷程〉，收入吳倫霓霞編，《邁進中的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三十年》（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3），頁 12。

40 United States Aviation Problem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 September 23, 1955, CK 2349598727.

41 關於基金會如何為中央情報局在海外展開掩護、滲透的隱蔽行動，參考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的研究。她指出形形色色的基金會、慈善機構或文化機構的文件上如果寫有「自由的」、「私人的」字樣，必定是中央情報局的外圍機構，這很可能反映當時人們的共識。見桑德斯著，曹大鵬譯，《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2），頁 142-161。勞格森（Amanda Laugesen）也指出美國當局在境外推動文化冷戰時，在幕後資助各種基金會印製出版物。Amanda Laugesen, “American Publishers, Books, and the Global Cultural Cold War: Alfred A. Knopf Inc.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1953-1970,”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35, no. 2 (December 2016, Sydney), pp. 19-37.

臺灣人文與社會期刊資料庫

泛與徹底的政治功用。[42]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下轄的「心理戰略委員會」（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PSB）主導了中央情報局執行的各種心理戰計畫，其中「學術性行動計畫」（Doctrinal Program）目的是贏取與共產主義之間的意識形態戰爭。它的具體內容包括提供經費予教育機構，以進行各種學術交流、人員交換計畫，也資助教授執行研究項目及出國訪問；並大量贈送美國書籍及翻譯作品，由香港美國新聞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in Hong Kong）贈送或租借視聽資源、舉辦講座、籌辦研討會、出版專著和學術刊物、建立圖書館、籌辦出版社等。[43]

在香港，各類基金會協同美國新聞署執行文化冷戰策略，積極向私專院校提供辦校費用，及捐贈校園設施、贈送書籍與影視設施、撥發經費籌辦康樂文娛活動、建立供私專院校師生使用的孟氏基金會（Mencius Foundation）圖書館、協助發展院校圖書館及資助出版事宜、舉辦聯校演講會與展覽會等，不一而足。透過這些文化冷戰工作，美國既輸出反共思想，也生產新的知識體系，試圖改變海外華人對中國共產黨與美國的看法。為美國在「冷戰香港」實踐文化戰略的活躍基金會，大致為亞洲協會（Asia Society）、亞洲基金會（The Asia Foundation）、[44]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它們為私專院校及來港中國知識分子提供援助。還有一些較專注於教育及學術研究的基金會，諸如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耶魯大學雅禮協會（Yale-China

42 桑德斯，《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頁 164-165。

43 The U.S. Doctrinal Program, PSB D-33/2, Memorandum for the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May 5, 1953, CIA-RDP80R01731R003200050006-0. 本檔案下載自美國中央情報局網站（www.cia.gov）。相關研究另參桑德斯，《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頁 163-169。美國新聞署曾多次外借大批有關遠東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書籍給香港的專上院校舉辦書展，見〈學院消息〉，《中文大學校刊》第 1 卷第 10 期（1965 年 4 月，香港），頁 4。

44 Asia Society 成立於 1956 年，為約翰・洛克菲勒三世（John D. Rockefeller 3rd）創立，其譯名為「亞洲協會」。後文論述的香港中文大學及多所專上學院的主要資助者是 The Asia Foundation（亞洲基金會），它創立於 1954 年。在 1960 年前後，The Asia Foundation 的一些譯名會被稱作「亞洲協會」。為免混淆，本文將以英文原文作準，把 Asia Society 一概譯作「亞洲協會」；The Asia Foundation 則一概譯作「亞洲基金會」。

臺灣人權學術出版資料庫

Association）、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嶺南基金會（Lingnan Foundation）、香港孟氏基金會（由美國亞洲基金會贊助）。[45]

上述基金會，有些以香港作為亞洲的情報站，及西方民主政治的宣傳基地，實現上述美國在港對華政策以及圍堵共產主義擴散的工作目標。以亞洲基金會為例，它是執行美國針對東南亞反共宣傳事務的機構之一，轄下專責開展面向海外華人的「情報及教育項目」，目的是完善美國在港領事館、美國新聞署的反共工作。它與美國官方機構合作，透過文化教育、媒體輿論、書刊印刷、學術研究及文學創作、訪談口述或調查報告等形式，揭露共產中國的政治與社會問題，並為各種反共團體提供經濟援助。[46]後文論述的中文大學本部第一批建築群與首任校長聘請事宜，即涉及該基金會的捐款。

由於戰後資源匱乏，英國或港府甚少資助專上教育，亦因為冷戰局勢下的香港前景不明，難作長遠規劃。只要私專對港府管治不構成威脅，且辦學者有充足經費，便可申請辦校。借用新亞書院創辦人錢穆（1895-1990）之話，港府對於私專「既不禁止，亦不補助」。[47]但大多數私專難逃財困厄運，為求生存，最後都要向美國尋求資助。美國當時在亞洲開闢戰場，持續增強在亞太地區的綜合影響力，除了從軍事、政治層面增加對香港的地緣影響力之外，在文化教育方面也投放大量資源。在香港公開活動的各個美國基金會，或為在港中國知識難民提供前往臺灣的資金，[48]或為私專提供獎學金、校園設施、教師薪金、圖書購

45 關於美國基金會如何為香港私專及南來知識分子提供援助，另見陳學然、張志翔，〈冷戰時期香港「教育條例」修訂與私立專上院校發展（1948-1958）〉，頁 141-144。桑德斯認為洛克菲勒、福特、卡內基等基金會都是「美國冷戰機器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專門掩護中央情報局行動，見氏著，《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頁 142-161。

46 NSC Report 6007 on U.S. policy toward Hong Kong, May 9, 1960, pp. 15-16.

47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3），〈新亞書院（續二）〉，頁 275。

48 如洛克菲勒基金會、福特基金會在援助知識難民方面，便受美國政府倚重。當局資源拮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置等援助。[49]這些基金會主動援助私專及香港文化教育發展，動用大量人力、物力協助英國救濟大批難民，提供衣食住行之便與醫藥衛生救濟，也為南來知識分子贊助印刷出版與開辦文化教育事業的經費，力求擴展文化冷戰戰線，鞏固香港作為圍堵共產主義在亞洲擴散的前哨站。

教育是文化冷戰戰線的重鎮，不但設有專項、專款供應，就連難民救濟的食物專項下，也另設教育專款。根據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檔案所示，美國於 1958 至 1961 年間，透過第 480 號公共法案「和平食物」（Public Law 480; Food for Peace; 設有「自由食物」〔Food for Freedom〕專案），每年捐助香港 400 萬美元，並涉及難民、情報、教育交流等項目。單從「教育交流項目」專案帳面觀之，教育經費分別是不足 6 萬美元（1959）及 3 萬美元（1960），似乎所佔比率不高；然而，真正支付香港教育經費的是具備政治戰略意義的「難民項目」及「情報項目」專案。前者 1959 年的經費是 100 萬美元，1960 年高達 200 萬美元；後者每年亦有 80 萬美元。[50]從後文的論述可見，1960 年代中文大學校園首批建築與教研經費，不少是由針對遠東地區的「難民項目」及「美國經援協會」（Cooperative for American Remittances to Everywhere, CARE）撥款捐助。[51]這些經費因應遠東冷戰形勢而設立——從中文私立專上院校辦學，

據時，它們也會協助大型救濟及援助。1952 年，美國國務院在中央情報局協助下，為 1,000 個中國知識家庭提供赴臺定居的各種資助，首 100 個家庭各得 380 美元，其餘 900 個家庭各 300 美元。“Aid for refugee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Hong Kong,” Department of State, October 29, 1952, CK 2349198160. 美國政府在香港還設立了「援助中國知識分子協會」（Aid Refugee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c., 簡稱援知會），有關該會在香港的活動及其與港英政府的互動，可見 Glen Peterson, “Crisis and Opportunity: The Work of Aid Refuge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RCI) in Hong Kong and Beyond,” in Roberts and Carroll, *Hong Kong in the Cold War*, pp. 141-159.

49 “Report on Hong Kong Private Chinese Post-Secondary Institutions.”

50 NSC Report 6007/1 on U.S. policy toward Hong Kong, June 11, 1960, pp. 15-16.

51 「美國經援協會」或簡稱「美經援會」，全稱為「美國經濟援助協會」（CARE 的 “E” 本指 “Europe”，後隨著美國冷戰幅度擴至全球而改為 “Everywhere”）。它是人道救援的非政府組織，後來成為美國政府在外交及政治方面的武器（valuable diplomatic and political weapon），是標誌著掀起冷戰帷幔的「馬歇爾計畫」的時代產物之一。

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資料庫

到中文大學成立以後的校園發展，均蒙其挹注，難怪中文大學多年來被稱為「難民大學」、「流亡大學」。這既是錢穆、唐君毅（1909-1978）等創辦人對新亞書院的自況，也是美國對私專及中文大學的稱呼與定位。

除了美國官方機構，林林總總的基金會對私專的援助，多年累積下來亦頗為可觀。[52]其中尤以崇基、新亞及聯合三所書院獲得最多美援，這與它們在美國的駐港基金會代表積極牽線、組成專上聯校協會，有很大的關係，珠海書院、香江書院等因辦學者各有自身考慮而未加入協會。以下將進一步闡述三所核心書院在合併成中文大學前與美國機構的往來關係。

（二）美援與香港三大私專院校的發展

戰後港府只對香港大學及官辦師範學院提供經費，崇基書院是少數較早獲得港府重視的私專，也是最早獲得「學院」稱號的私立專上中文院校。葛量洪在戰後有意讓美國相信香港是「東方柏林」、「自由堡壘」，他的冷戰詞彙同樣見於崇基校園的定位，使之成為展示香港的「場地」。[53]在冷戰氛圍瀰漫的政治情境下，港督的言論與美國政府的意圖相若，皆將香港視為展示西方自由世界，充滿法治、秩序以及沒有恐懼的窗口。1954 年，葛量洪批撥中文大學現址，興建崇基書院校舍，使之座落在九龍通往廣州的鐵路沿線上，名符其實地成為展示香港宗教、學術多元與自由的「場地」和「窗口」。

崇基書院由英國及歐美背景的教會，如聖公會、中華基督教會、循道公會、衛理公會及崇真會等基督教宗派所支持創辦，故當時校內的管

52 U.S. Policy on Hong Kong: Financial Implications – Summary Tabulation of Expenditures (Fiscal Years – Millions of Dollars), NSC Report 6007/1 on U.S. policy toward Hong Kong, June 11, 1960, p. 30.

53 “Residential Campus: Governor open new Building of Chung Chi Colleg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ember 24, 19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理機制與人力組成頗具美國色彩。1958 年，崇基共有 76 名學術人員（academic staff），當中 56 名為華裔，絕大部分畢業自美國的大學。20 名外籍成員中，有 13 位美國人、5 名英國人以及 2 名其他國籍者，他們大部分於 1949 年隨學校撤退至港。[54]

有聖公會及眾多基督教教會作為後盾的崇基書院，辦學條件比其他私專更為優渥，不至於如新亞書院般掙扎求存。當新亞最為艱困之際，亞洲基金會、雅禮協會、哈佛燕京學社相繼伸出援手，向錢穆提出資助方案。[55]部分基金會在撥款與否時，有其文化反共的冷戰政治考慮。雅禮協會代表人盧鼎（Harry Rudin, 該校歷史系主任）與錢穆晤談時，預備逾 20 道問題，首條便詢問錢穆「君來港辦學校，亦意在反共否」——在確定新亞辦學並不完全排除反共的目的下，方才願意資助。[56]該會給予新亞每年 25,000 美元的高額資助，並委託解放前便於長沙任教、適時留港的蕭約（B. Preston. Schoyer, 1911-1978）交收款項——下文將可見，蕭約往後對於新亞的發展方向、乃至日常的校內財務收支，均發揮難以忽視的影響力。

蕭約繼朗家恒（Charles H. Long, 1954-1958 在任）、羅維德（Dr. Sidney Lovett,[57] 1958-1959 在任）後，於 1959 年成為第三任雅禮駐新亞書院代表，監督捐款運用。1959 年，蕭約成為新亞財政主管；1963 年則出任新大學的「財務及人事委員會」委員、大學校董兼新亞副校長、中大校長特別助理等要職。蕭約 1933 年自耶魯大學畢業後即久居中國，在長沙教授英文。1942 至 1946 年他復以美國空軍身分派駐中國工作，1952

54 “The Chinese Colleges in Hong Kong, A Memorandum by the Chinese Colleges Joint Council,” June 1958, p. 12, NA, CO 1030/571.

55 錢穆，〈雅禮和新亞雙方合作三年來之回顧與前瞻〉（原刊於 1957 年），收入氏著，《錢賓四全集第 50 冊・新亞遺鐸》（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頁 113；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新亞書院（續一）〉，頁 259-266。

56 錢穆，〈新亞書院（續一）〉，頁 264。相關論述另見陳學然、張志翔，〈冷戰時期香港「教育條例」修訂與私立專上院校發展（1948-1958）〉，頁 143-144。

57 後文將提及羅維德 1962 年初曾提名吳大猷出任中大首任校長。

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資料庫

年以雅禮協會駐港代表身分居港。[58]錢穆指蕭約「與港政府人多相熟」，是新亞併入中大過程中的溝通橋梁。不論是 1962 年的臨時校董會或 1963 年後的中大校董會，他都是大學高層成員，還以新亞代理校長身分出席首次舉行的權力中樞「教務會議」（Senate）。蕭約本職是雅禮協會駐新亞聯絡人，卻手握新亞及中大的財政運用實權，在中大成立過程中舉足輕重，[59]其後還出任「大學服務中心」（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er, USC）主管一職。

大學服務中心由一群在 1949 年代從大陸撤退到港的美國學者發起，為來港進行短期訪學或學術研究的美國學者與學生提供服務。1963 年之前，組織鬆散，沒有固定會址。自 1963 年秋天開始，美國非政府組織「教育及世界理事會」（Education & World Affairs, EWA）在卡內基基金會（Carnegie Corporation）資助下，重新籌建該中心，並改為現名，也在香港九龍的旺角地區成立辦事處。自中大成立迄今，大學服務中心便與中大關係密切，並且爭議不斷。

廣為人忽略的是，主導大學服務中心發展事務及人事任免的，就是 EWA。1960 年時任美國國務卿赫脫（Christian Herter, 1895-1966）授命專責教育及文化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賽耶（Robert H. Thayer, 1901-1984）成立 EWA，[60]協助美國政府執行全球教育政策研究。EWA 理事會由美國政府代表、各大基金會、大學、商界與專業領域代表組成，總部在紐約市。福特基金會、卡內基基金會分別撥出 200 萬美元及 50 萬美元，作為 EWA 首五年的營運經費，首任理事長由卡內基基金會的高級行政人員馬

58 〈新亞書院代理副校長〉，《中文大學校刊》第 1 卷第 5 期（1964 年 11 月，香港），頁 5。

59 關於蕭約個人資訊及其參與新亞發展、私專合併的部分介紹，另見陳學然、張志翔，〈文化冷戰：美國對香港高校的交流計劃〉，《東亞觀念史集刊》第 17 期（2019 年 12 月，臺北），頁 227。

60 關於 EWA 的創立緣由及目的，身為創會核心成員的美國印地安納大學校長威爾斯（Herman B. Wells），在其回憶錄裏有十分詳細的闡述。Herman B. Wells, *Being Lucky: Reminiscences & Reflection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352-362.

臺灣大學機構典藏資料庫

維爾（William Marvel）兼任。EWA 甫成立，便設立了兩大工作項目。[61]

第一個項目名為海外教育服務（Overseas Educational Service），直接承擔美國政府交付的合約，為美國在全球的教育、文化發展工作提供建議及指引。馬維爾曾親自帶領美國當局（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職員執行調查工作。他撰寫的報告書，清楚說明相關戰略研究成果是為美國 10 個涉及國際事務的「主要」機構（the ten "primary" agencies）提供參考，包括國務院、美國新聞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USIA）、國防部、中央情報局等。[62]馬維爾與美國官方、軍方關係密切，充當外交關係委員會成員及多項公職。[63]

另一個便是設立於香港的大學服務中心，主要目的為美國或外國學者提供有用的聯繫渠道，以獲得有效的研究資源，快速產出研究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它還背負一項使命：被期望「能夠為香港本地的政治環境提供建議及指引」（It hoped to give advice and guidance on local political situations.）。[64]

大學服務中心由 EWA 的管理委員會直接管轄，下設一個由 12 名英、美及加拿大等國家的學者組成的國際顧問委員會，就中心發展提供建議；EWA 理事長馬維爾與蕭約是其中 2 名委員。他們與剛創建的大學

61 Wells, *Being Lucky: Reminiscences & Reflections*, p. 356.

62 "Directions for the Future Federal Programme in Education Designed to Improve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 by William W. Marvel, March 1969, accessed November 4, 2022, https://files.eric.ed.gov/fulltext/ED040628.pdf, p. 3.（下載自美國教育科學院贊助的教育資源中心（Education Resources Information Center）網站）。另外，張楊也提及 EWA 作為組織化的隱蔽化活動機構，與中情局之間存在一些關係。見氏著，《文化冷戰》，頁 146-147。

63 "Marvel, Dr. William, president, Education & World Affairs," in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executive reorganization of the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oper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 Eight-ninth congress, June 27, 28, and July 19 1966*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7), p. 157.

64 Wells, *Being Lucky: Reminiscences & Reflections*, p. 35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服務中心，很快便受到港英政府以至倫敦當局的關注。[65]

最初，引起港府關注的是該中心人事任命衍生的司法訴訟問題。1964年1月至2月初，EWA解除了原主管葛雷（Robert Grey）的職務，改由蕭約接掌。蕭約上任前，由另一創辦人孔傑榮（Jerome Cohen, 1930-；又稱柯恩，前哈佛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現為紐約大學榮休教授）以訪問學者的身分協理行政事務。被解職的葛雷聘請律師控訴EWA，並擾攘至香港當地法庭、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及美國國務院。香港政府及英國殖民地部（The Colonial Office）、外交部耗時半年才把事情解決。當局力避訴訟進入司法程序，目的是不欲此事廣為公眾及「共產黨政府」（CPG）所悉，否則將會把該中心營造成一種反共的美國情報機構的印象。[66]

承上，港督柏立基（Robert Black, 1906-1999, 1958-1964在任）早於1964年1月17日上呈殖民地部大臣的公函也曾明言，擔心美國在香港高等教育介入過深而引起中共抗議。他認為大學服務中心的事是不幸的。在他看來，不論是該中心還是它的學者活動，都應該是謹慎的，在公眾面前應該是非政治化的；它也應該體現國際化而非由美國主導的。這樣，中共雖警惕它的存在與功能作用，但也可能不會太在意它。然而，過份地宣傳或強調美國的援助，便會使人產生一種總體印象，顯示「它是一所美國資助且營運的組織，用以直接對抗中國以及從事某些情報搜集的工作」。柏立基指出中共對這種反抗社會主義以及美國在香港的各

65 根據英國外交部及殖民地部的數份文件，我們可以了解英國當局對大學服務中心、接任主管的蕭約及EWA是有所警惕的。參考W. K. Slatcher, Foreign Office to E. G. Willan, Colonial Secretariat of Hong Kong, 26 May 1964, Establishment of an Administrative Centre in Hong Kong for Chinese Studies, Far Eastern Department 1963-1965, NA, CO 1030/1721.

66 其中一則文件這樣說：“Our concern remains, as it has always been, simply that the 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 should be unobtrusive and should not create the impression in the eyes of the public or the C. P. G. that it is some kind of American intelligence organization directed against China.” 參見Colonial Office (London) to Colonial Secretariat (Hong Kong), ref. SCR 29/2041/63, 1 May 1964, Establishment of an Administrative Centre in Hong Kong for Chinese Studies, Far Eastern Department 1963-1965, NA, CO 1030/1721.

臺灣大學圖書館

種活動，是敏感的，會義無反顧地反擊。[67]

大學服務中心的複雜背景及學術使命，加上當局有意無意的淡化，讓它的存在角色與營運方式不斷地隨著香港政局的變化而變化，直到2020年底方才解散。[68]

資助EWA或大學服務中心的基金會，也是香港私專發展的資助者。早在1957年，新亞便獲得福特基金會捐贈鉅款，建築位於九龍農圃道的校舍。其他為中情局或美國政府提供隱蔽文化活動的基金會，1960年前後也紛紛為新亞、聯合、崇基等私專提供資助。1960年，洛克菲勒基金會為新亞捐資 47,500 美元，展開為期兩年的中國研究。亞洲基金會於1961年撥出港幣83,400元，鼓勵新亞開展與現實社會結合、能反映當代中國局勢發展的教研工作。[69]此外，新亞師生參與創刊、主持或主要投

67 Sir R. Black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17 January1964, NA, CO 1030/1535.

68 時至1980年代，圍繞「1997」香港主權的談判展開以來，特別是1988年公布適用於將來香港特區之《基本法》草案後，大學服務中心便不再以私人機構活動，自此歸併入香港中文大學，成為校內體制的一份子，再改名為「中國研究服務中心」（The 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 USC）。直至2020年被中大校方除牌及重組，此事引起香港及海外學界高度關注，分別有170多名學者及70名美國、日本學者聯名發表公開信，要求中大校方收回成命。報刊媒體多以香港2020年6月30日《國家安全法》生效來猜測 USC 被重組的原因，並且懷疑當局要藉此清除中大與美國遺留的因素。程翔，〈悼USC，哀香港〉，《眾新聞》，2021年1月6日發布、2021年1月10日更新（約為2021年2月檢索；因該電子報刊已停辦並刪除網域，故未能提供網址）。其他文章可見〈港中大中國研究服務中心面臨「重組」，學者憂「中國研究的參加」將不復存在〉，《英國廣播公司新聞網（BBC中文）》，2020年12月25日；2021年12月16日檢索，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5441519；〈香港中大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將拆解，校方卸除政治隱患〉，《美國之音》，2020年12月26日；2021年12月16日檢索，https://www.voacantonese.com/a/USC-At-CUHK-To-Be-Closed-Under-Alleged-Political-Pressure20201226/5714182.html. 在 USC 重組前，負責港區傅爾布萊特交流計畫（Fulbright Exchange Programme）的中文大學「港美學術文流中心」也早在2020年8月解散，參見〈頻曝對港進行政治滲透　港美中心已關閉〉，《香港商報》，2020年8月30日；2021年12月16日檢索，https://hkcd.com/content/2020-08/30/content_1211073.html；〈港美中心卧旗　滲透活動轉地下〉，《大公報》，2020年8月31日，A6版。

69 周愛靈，《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頁230-231。

稿的刊物，如《民主評論》、《中國學生周報》、《人生》、《祖國》，也在美援下得以經營。[70]

至於其他私專，錢穆指出它們在財務上同樣得力於「美國方面的資助」。[71]聯合書院校長鄭棟材（1917-2001）於 1963 年出任第三任校長時曾公開指出，與美國關係友好，是各私專獲助的原因。[72]為聯合書院提供協助的主要是亞洲基金會與亞洲協會，亞洲基金會是 1950 年代美國在香港繼領事館、美國新聞署後第三重要的情報單位，每年撥備 300 萬港元援助香港各文教機構。1960 年前後十數年間，不少香港報刊廣泛報導該會對專上院校的資助，其中一則新聞如此說：

> 亞洲基金會（The Asia Foundation）是協助香港專上教育發展最堅強外來勢力之一，每年用諸扶掖專上教育之款項，約達三百餘萬，目前之專上院校，如新亞及聯合書院，專上教育機構如孟氏基金會，每年均由該會給予數字相當可觀之款項協助。[73]

正如桑德斯所述，亞洲基金會、亞洲協會、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等打著「美國人民」旗號的組織或聲稱「私人的」機構，都是中央情報局的「掩護機構」，[74]往往擔負美國在海外心理戰／文化戰／宣傳戰的使命，積極推動文化反共宣傳項目及活動，對於戰後包括香港在內的美國海外文化教育發展，影響力不容小覷。[75]

亞洲基金會的功能，可以從一份它向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尋求金援

---

70 相關記述請見余英時的回憶，其論補充了乃師錢穆有關美國基金會如亞洲基金會對於新亞的資助情況，他還談及美國基金會對於香港南來學人圈子及文教出版事業的援助，見氏著，《余英時回憶錄》（臺北：允晨文化，2018），〈香港與新亞書院〉，頁 124-149。

71 錢穆，〈新亞書院（續二）〉，頁 275。

72 翁松燃，〈對外學術交流〉，收入吳倫霓霞主編，《明德新民：聯合書院四十年》（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1996），頁 38。

73 〈亞洲基金會在港資助專上教育發展：工作範圍甚廣，每年在港調用之款項約三百餘萬元〉，《華僑日報》（香港），1960 年 1 月 4 日，4 張 1 頁。

74 桑德斯，《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頁 149。

75 Draft statement of U.S. policy on Hong Kong, pp. 6-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計畫書看到：

> 亞洲基金會的基本目標：
>
> 1. 為亞洲地區的個人、組織以及公私營機構提供協助，開展有助於人類進步、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工作，為亞洲國家構建穩定向上而彼此同心協力的社區而服務。
> 2. 鼓勵和協調亞洲、美國與國際間關注亞洲發展的公私營組織之間的積極合作。
>
> 亞洲基金會致力於為亞洲人提供以下支援：
>
> 1. 強化他們的社會與在地的辦事機構。
> 2. 提供現代化教育及培訓。
> 3. 特別透過私營組織，推動更多人主動參與國家發展。
> 4. 與美國的同儕建立專業的連繫（professional links）。
> 5. 推動亞洲地域間的合作。[76]

1950 年代初以來私專的文教發展與交流活動，大致不離亞洲基金會對自身功能的描述，反映了亞洲基金會按照美國文化冷戰的方向擬備資助項目，而尋求該會資助的私專，順理成章在發展方向上作出配合。我們還可以看到，亞洲基金會直接影響著院校轉型與生存的命運。例如廣僑書院、光夏書院、華僑書院、文化書院、平正會計專科學校均從亞洲基金會獲得不少美援，[77]這五所院校並在該會主導下組成「聯合書院」。

亞洲基金會希望促成八所私專院校合併以組成「聯合書院」，但珠海書院、香江書院及廣大書院最終選擇退出計畫，亞洲基金會隨即宣布停止經費資助。該會轄下的孟氏基金會也公開指出「今後所協助者只為聯合、崇基與新亞三個單位」，從此不再援助未加入「聯合」的三校。[78]可見美援影響香港私專合併與發展方向，左右冷戰時期香港的高等文教事業。

---

76 “A Proposal Submitted to Rockefeller Brothers Fund by The Asia Foundation.”

77 錢穆，〈新亞書院（續一）〉，頁 270、280。

78 〈亞洲基金會有所解釋撤銷三間院校的補助〉，《華僑日報》，1957 年 2 月 18 日，2 張 3 頁。

臺灣人文學期刊資料庫

另外，在五所私校合併為聯合書院的過程中，亞洲基金會扮演了重要角色。1956 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校長、福特基金會兼亞洲基金會董事柯克（Dr. Grayson Kirk, 1903-1997）訪問香港。當時，十多名在港私專院校任教的哥倫比亞大學校友，向他提出資助要求，由此催生成立香港「聯合書院」的規劃。亞洲基金會承擔了聯合書院創建時期的主要財政開支，為講座教授提供 800 元月薪，教授 350 元，每年再撥款 3 萬美元作院校經營費用。在 1957 年至 1958 年的財政年度裡，亞洲基金會給予聯合書院的捐款高達 130,000 元，其次是孟氏基金會提供 45,000 元補助金並每年支付 10 名專任教員薪資。此外，亞洲基金會還為聯合書院的工讀生提供高達 160 元港幣的工資，高於一些全職中小學教師的 100 元月薪。[79]相比於其他院校，美國給聯合書院的資助金額特別多，高達其支援香港總開支的 24%。[80]

聯合書院校董會的組成，除了香港本地的政商名流，自然包含捐款的亞洲基金會、孟氏基金會的負責人。聯合書院既獲得亞洲基金會的長期資助，其發展方向與行政亦須受其監察。書院董事兼院務委員會主任、文學院院長陳炳權便曾指出，聯合書院在行政上本擬採用委員制管理校務，但是在「各種組織章程通過後送交亞洲協會（按：應是亞洲基金會）香港主任艾維先生，請求撥款資助。艾氏閱過後以為應設校長負其專責，於是又改為校長制。」當書院要「加強校務發展」時，董事會要特聘美國背景人士出任榮譽董事，指導相關工作。[81]當中，除了柯克，還包括

79 〈五十載同窗憶良師聚首話當年：1957-1961 年聯合書院校友訪談記〉，《聯合邁進》第 7 期（2010 年 9 月，香港），頁 8。

80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Box P-57, Hong Kong Program Media Textbooks General, 1956-1957, 轉引自張楊，〈亞洲基金會：香港中文大學創建背後的美國推手〉，頁 97。

81 陳炳權，《大學教育五十年：陳炳權回憶錄》（香港：香港南天書業公司，1970），〈香港聯合書院乃中文大學之參與〉，頁 564-571。另有關美國援助中國知識分子協會是如何「藉援助難民之慈善活動為名，以達成其反共外交之目的」，以及如何支持私專或資助出版物以抗衡共產主義擴散的研究，參趙綺娜，〈冷戰與難民援助：美國「援助中國知識人士協會」〉，《歐美研究》第 27 卷第 2 期（1997 年 6 月，臺北），頁 65-108。

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資料庫

亞洲基金會會長布朗博士（Dr. Robert Blum）、前美國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Dr. J.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援知會會長周以德（Walter H. Judd, 1898-1994, 共和黨眾議員）、援知會遠東區代表費吳生（George A. Fitch, 1883-1979）、美國前遠東司司長洪貝克（Stanley Hornbeck, 1883-1966），以及著名美國出版商魯斯（Henry Luce, 1898-1967）。[82]

上述種種，反映聯合書院的行政決策與組織制度的確立，需要獲得亞洲基金會首肯才能生效。在書院的最高決策層，美方具有左右大局的權力。1963 年 11 月 17 日中大成立典禮上，曾任大學籌備委員會主席的關祖堯（1907-1971）報告籌備經過時，點名致謝三個「文化和慈善機構」的幫助，其中兩個便是亞洲基金會以及孟氏基金會。[83]

二、從發展私專到建立中文大學

聯合書院儘管有基金會的援助，但要維持 17 名專任編制教師、50 名兼任教師及 600 名學生的日常開支，仍頗感難以為繼。此外，倘若港府不給予資助或不認可學歷，單憑基金會之力，恐怕也未能維繫有效運作，遑論向上發展。[84]根據 1950 年在港與張君勱（1887-1969）創辦《再生》雜誌的王厚生所言，美國的援助政策是「助人自助」、「援外必須以『自助』為條件」，即是提供了一定的啟動資金或援助後，便由受助者自力更生，不能自助的國家或團體則得不到基金會更多援助。[85]因此，

82 〈聯合書院聘請十二位博士為名譽董事〉，《工商日報》，1956 年 12 月 9 日，頁 5。魯斯為《時代周刊》（*Time*）、《財富》（*Fortune*）及《生活》（*Life*）的創辦人。

83 〈香港中文大學成立典禮紀盛〉，《聯合校刊》第 8 期，1963 年 12 月，頁 14。

84 吳倫霓霞，〈建校的歷程〉，頁 12-13；吳倫霓霞、劉義章，〈書院的建立與發展〉，收入聯合校史編輯委員會、吳倫霓霞主編，《明德新民：聯合書院四十年》，頁 7；陳方正編，《與中大一同成長：香港中文大學與中國文化研究所圖史 1949-1997》（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0），頁 17。

85 王厚生，〈論以自助為基礎的美國外交政策〉，《再生》1950 年第 7 期（香港），頁 2。《再生》也是獲美援才得以創辦的第三勢力刊物。見黃克武，《顧孟餘的清高》（香港：

臺灣大學期刊資料庫

三院的校長於 1957 年籌組「香港中文專上學校協會」（專上協會），並進一步向港府爭取書院的資格認證，實為順理成章之事；而推動者正是美國在港基金會的代表們。

擔任專上協會秘書的雅禮協會駐新亞第一任代表朗家恒，是推動協會成立，以至爭取創辦第二所大學的重要推手。他早於 1956 年便致函教育司高詩雅（Douglas James Smyth Crozier, 1908-1976; 教育司等同今日香港的教育局局長），就大專學院的地位、水準及學術資格問題，敦促港府訂立法例，使私專進入教育體制。他認為港府要擔負辦校責任，提供基本設備與經費支持，改變院校一直依賴外國機構、教會或私人資助的作法；並指出港府要承認私專畢業生的資歷，減少他們在陸、臺升學，造成香港人才流失。[86]

朗家恒的言論，部分針對當時為數不少的學生轉赴臺灣及中國大陸升學的問題而發。適時正值冷戰年代，亦是海峽兩岸政府爭取海外知識青年及人心歸向的時期，故紛紛提出各種優惠條件吸引香港僑生。然而私專的人力、物力以及資歷不受港府認可等限制，已經導致中學生難以升讀香港大學，獲取官方認可的學歷。如政府不回應社會有關增加大學學位教育機會的訴求，除造成人才短缺、增加內部民怨外，在國共兩黨控制地區接受高等教育的大批青年學子回港之後，更可能成為港府管治的不穩定因素。這一切將影響港府的教育主導權與社會管治權，借用論者的話就是「破壞了殖民地政府教學機制的成效」。[87]

朗家恒也指出香港社會不斷有新創大學的訴求，但是影響港府高等教育政策的香港大學領導層持反對意見，港府的態度亦曖昧不明。時任港督葛量洪委任香港大學校董賈士域（John Keswick, 1906-1982）成立委員會，調查香港興辦第二所大學的可能性，但以其為名的《賈士域報告書》（*Keswick Committee's Report*）徹底否定了這一訴求，只建議在香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頁 249。

86 吳倫霓霞，〈建校的歷程〉，頁 13-15。

87 黃庭康，《比較霸權：戰後新加坡及香港的華文學校政治》，頁 189。

臺灣人學術期刊資料庫

港大學增加一些中文授課的課程。1958 年私立中文專上院校群趨籲求成立新大學時，身兼港英政府教育顧問的香港大學教育系系主任皮理斯（Kenneth Ewart Priestley），公開撰文反對。[88]專上協會主事者兼私專校長的錢穆、凌道揚（1888-1993）、蔣法賢（1903-1974）聯名發表文章，從學理、社會需求及民族情感諸方面反駁皮理斯，重申急需成立第二所大學的必要性。[89]

由上可見，香港華人社會創建新大學的訴求，多年來遭到英國教育官僚杯葛。香港大學作為英國實施殖民統治象徵的最高學府，其目的之一便是培養香港本地高級公務人員。新大學可能造成的資源競爭或將動搖港大的獨尊位置，皆為港大教育官僚所不樂見。[90]

基本上，港府在 1950 年代末態度丕變，願意建立新大學，是基於以下時變、時需所致：第一，回應社會成立第二所大學的強烈訴求；第二，解決青年學生紛紛前往海峽兩岸高校升學引發的複雜政治挑戰；第三，培訓高級專業人才，以應對社會經濟轉型；第四，收編美國基金會與親國民黨背景人士建立的專上院校教育權。[91]自專上協會 1958 年提出建立

88 K. E. Priestley, “Does Hong Kong Need More than One University?” in *Some Problem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Hong Kong: Five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ember 18-22, 1957*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 10-14.

89 凌道揚、錢穆、蔣法賢，〈中文學院聯合會對皮理思教授專論之分析及評論〉（1958 年原刊於《香港高等教育問題之商榷》），收入中大五十年編輯委員會編，《中大五十年》（香港：中大五十年編輯委員會，2017），頁 1-10。有關港府及港大教育官僚成立第二所大學的態度及因應青年學生前往兩岸升學的顧慮的論述，另見陳學然，〈時與變——戰後香港的私專教育事業〉，收入李帆、黃兆強、區志堅主編，《重訪錢穆》下冊（臺北：秀威資訊公司，2021），頁 169-170。

90 葛量洪便指出，港府曾經有意成立一所用中文教學及有水準的大學，藉以杜絕中共在香港成立大學而與港大「分庭抗禮」的危險性，但是，此議遭到港大反對而作罷。葛量洪，《葛量洪回憶錄》，頁 205。

91 港府未收編或掌握私專辦學權時，私專院校可自行聘請各級教員或行政人員，但如私專聘請國民黨官員或政府前要員，往往讓港府在國共／左右之爭中感到為難。譬如新亞書院聘請國府前教育部次長吳俊升（1901-2000）由美國赴港任職，便擾攘了頗長時間，據校長錢穆所言，是因港府中人「頗懼大陸忽提抗議」，而使吳氏任命遭留難。錢穆亦自

新大學的動議後，短短不足一年，港府便於 1959 年 6 月宣布在該會基礎上統一各校辦學標準，如成立委員會，統一聯合、崇基、新亞三校的招生考試、文憑頒發、人事編制規定。私專院校間的課程被要求彼此協調，同時也須配合港府的實用導向學科規劃。譬如，新亞書院便被要求減少文史學科，多培養教師人才，多開設實用工藝課目。[92]港府接著認可三校辦學資歷，進而啟動三校接受政府財政補助的程序。但私專院校一旦接受政府補助，也意味著接受規管；港府迫不及待要求這批受助院校「去政治化」。以新亞為例，被勒令不准懸掛中華民國國旗、不得以 10 月 10 日為校慶日，使之與臺灣「雙十國慶」分離。新亞師生雖反抗，最後還是屈服於港府可能撤銷補助、將之剔除出新大學名單的威脅。[93]

對於包括錢穆在內的新亞師生而言，如院校未獲港英政府的資歷認可，除了影響學生出路，亦難招收優秀學生，在港府有意成立新大學的背景下，這將使新亞缺乏競爭力。因此，三校順理成章服膺於港府啟動的院校補助規條。港府也著手草擬《專上學院條例》（The Post-Secondary College Ordinance），訂明「專上學院資助規例」（Post-Secondary Grant Regulations），規範受助院校權責、義務以及資助條款、教員資格與薪資等級。其後，港府邀請英國薩塞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Sussex）校長富爾敦（John Fulton, 1902-1986）來港考察，為新大學體制勾勒藍圖。富爾敦於 1960 年 3 月呈交考察報告《香港專上學院發展報告書》（The Development of Post-Secondary Colleges in Hong Kong），建議成立一所

謂個人舉動也因被告密而受港府監視跟蹤，且這種情形「不勝枚舉」。錢穆，〈新亞書院（續二）〉，頁 283。基本上，從理想的一面來看，收編私專有利港府實踐政治中立的原則，有效平衡或控制國共兩黨或左右兩翼人士在香港的勢力。這種「非政治化」社會管治措施，尤以「雙十暴動」後更為著跡，目的是不欲國民黨勢力在港坐大而引起中共的抗議。江關生，《中共在香港．下卷（1949-2012）》（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12），頁 79-80。

92 Griffith's report, New Asia College-Exhibition held by the Arts Faculty, 18 August 1959, HKRS 147-3-3. General Correspondence Files (Confidential), Hong Kong Government Record Service.

93 有關港英政府公布對私專提供補助方法後的管理手法，參考陳學然、張志翔，〈冷戰時期香港「教育條例」修訂與私立專上院校發展（1948-1958）〉，頁 150-155、180-182。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以中文作為官方教學語言的聯邦制（federal）大學，並對大學制度、行政、課程、教職員資歷、學生素質到財政配置等提出規劃，還分析了聯邦制及統一制（unitary）辦校模式的優缺點。[94]

1960 年 5 月，香港立法局三讀通過《專上學院條例》。[95]自此，三校不再是次等「初級學院」，也不再只是升讀大學的過渡性「橋樑」，而是落實《香港專上學院發展報告書》建議，成為政府認可的「學院」。[96]新大學的成立，回應了多年來的社會訴求，也算是尊重了華人的民族情感。於港府而言，新大學的實際意義是因應市場經濟轉型的急切需要，為港府培訓工商專業人才。[97]但從政治角度觀之，港府把經營相對成功的院校整合成公營大學，在吸納美援的成果之餘，還可直接主導這些本受美國影響的私專教育發展方向，有助於重塑戰後威信薄弱的港府在地管治權。

正如錢穆指出，港府在 1950 年代末願意籌建新大學，並非無緣無故，而是對新亞、聯合、崇基取得美國資助後不斷發展，感到「意有不安」，故有「創辦一新大學之動議」。[98]曾任中大秘書長的陳方正，也認同錢穆有關「不安」因素的看法。[99]當私專教育經費不少來自美援時，美國對於私專的影響力難免讓英國忌憚。教育司高詩雅便基於專上中文院校深受美式影響而拒用英國模式的問題，提出政府要加強監管這些院

94 The Development of Post-Secondary Colleges in Hong Kong, A Report Submitted to His Excellency, the Governor by Mr. J. S. Fulton, 1959, HKRS 163-3-80.

95 見 1960 年香港立法會會議紀錄。Mintues of Meeting of 18 May 1960,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https://www.legco.gov.hk/1960/h600518.pdf.

96 有關成員書院的社會印象，可見吳倫霓霞，〈建校的歷程〉，頁 10。

97 崇基書院校長凌道揚便有這種看法。見氏著，〈扶植本港高等教育之重要〉，收入胡般編，《香港現行教育法規條例彙編》，頁 43。

98 錢穆，〈新亞書院（續二）〉，頁 280。錢穆對於港府成立第二所大學的動機的相關論述，另見陳學然，〈時與變——戰後香港的私專教育事業〉，頁 170。

99 陳方正同時也指出中大的成立，與英國改變海外殖民地管治方式、放棄高等教育菁英主義有關，故創建中大是迅速擴張高等教育系統的結果。陳方正編，《與中大一同成長》，頁 17。

臺灣人文社會研究資料庫

校，在學術、行政及相關人員聘用的權力上要扮演更大的角色。[100]事實上，英、美兩國在香港教育領域上的較量，不但可見於私專的收編過程，即使是中文大學成立後亦未停止。[101]

三院長期與美國基金會來往，即使過渡至中大仍繼續領取資助，美國的影響力並未因而減退，無論英國或是港府，要在中大籌建過程中完全掌控話語權、樹立其文化教育權威，也不是一蹴可幾。事實上，當中大的建立是為了有助推動戰後香港經濟轉型及發展時，那麼不只中大發展，就連香港本身的經濟發展也同樣受制於美國。

1961 年 3 月，港府委派三院校長（錢穆、凌道揚、容啟東〔1908-1987〕）、教育司、華民政務司共 12 人組成「大學籌備委員會」，展開建校選址及校舍建築籌備工作。並於 1962 年 5 月再度邀請富爾敦來港，召開由 6 名國際學者專家組成的「富爾敦委員會」，當中規定要有 1 名美籍華人。後來出任校長的李卓敏，便在港督柏立基與英國殖民地部協商下，以美籍華人的角色進入委員會。[102]「富爾敦委員會」的職責是對成立新大學的制度，諸如教學語言、各書院與大學本部的權責、大學本部管理架構、財政運作、學術發展方向乃至人事任命等定下基調。該報告書也以《富爾敦報告書》命名，於 1962 年 8 月呈交給柏立基，當中附設的《香港新聯邦大學條例》草案，於 1963 年成為《香港中文大學條例》，並於是年 10 月 17 日的中大成立當天公布和生效。

1963 年 6 月 13 日，港府宣布採納該份報告書，組成「臨時校董會」，

100 Meeting note (檔案頁 103). A meeting held in Mr. Wallace's room on 3 July 1958, attended by Sir Christopher Cox, Mr. D. J. S. Crozier, Mr. W. I. J. Wallace (助理殖民地大臣) and Mr. Farran (殖民地部官員), NA, CO 1030/571.

101 當時的學生／校友根據港府「專上撥款法案」的討論中，注意到港府成立中大以收編各私專院校，是希望從美國手上「奪回對這些大學發展的控制權」。馬鞍山，〈從中大發展看香港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中大學生報》第 7 卷第 2 期，1975 年 4 月 20 日，頁 4。

102 Christopher Cox to Maxwell, 12 January 1962,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NA, BW 90/558, 1962, Record of British Council.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行政及立法兩局議員關祖堯為主席，成員包括三院院長、港府官員及香港紳商代表共 20 人。6 月 24 日，港督再委任關氏出任由 9 名臨時校董組成的「校長遴選小組」主席，展開校長選拔及籌備新聯邦制大學事宜；又於同年 7 月 2 日將新大學命名為「香港中文大學」。即將成立的中大，在當時海外華人社會眼中，被看成百年來香港教育界、亦為海內外華人教育史的一項大事。[103]

三、選拔中大首任校長的美國因素

校長是大學發展之靈魂人物與舵手，其聘用準則及人選，都是大學發展至為關鍵的問題——尤其是英國殖民史上首所用中文作為教學語言的大學。負責校長遴選工作的，名義上是在港成立的校長遴選小組，但甄選候選人以供香港當局考慮的，是遠在倫敦、主管英國殖民地政務的殖民地部與海外高等教育諮詢委員會（Inter University 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Overseas, IUC）。殖民地部專責教育事務的官員卡特（W. S. Carter）寫信給里茲大學（University of Leeds）校長兼 IUC 主席莫里斯（Charles Morris, 1901-1979），指當局希望他能與富爾敦爵士共商校長人選，並建議去信哈佛大學校長普西（Nathan Pusey, 1907-2001），請他們評估由美國人出任中大校長的可能性。[104]

在殖民地部官員與富爾敦、普西、莫里斯以及港督柏立基的往來通信中，可以歸納出中大校長人選要具備三個條件：一、具美國教育背景；二、具國民黨背景或曾在國民政府工作（這可能與組成中大的三所成員書院的親美、親國民黨背景有關）；三、最好是廣東籍人士，方便與香

103 唐君毅，〈新亞的過去、現在與將來——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七日新亞道別會演講詞〉，收入氏著，《唐君毅全集第 16 卷．新亞精神與人文教育．宗教精神與人文學術》（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頁 159。

104 W. S. Carter to Charles Morris, 11 September 1962, Appointment of Vice-Chancellor for New Chinese University in Hong Kong, 1962-1963, NA, CO 1030/1099.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港本地人士溝通。上述準則是否為美國與英國殖民地部預先商談而得的共識，目前暫未見及相關資料紀錄。

莫里斯給柏立基的信中，附有一份名單，由當時 36 所頂尖研究型大學組成的美國大學協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物色，交由普西整合而得。[105]有關人選共 9 名，簡介如下：

陳榮捷（1901-1994）：哲學家，博士畢業於哈佛大學，任教於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

趙元任（1892-1982）：語言學家，博士畢業於哈佛大學，任教於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戴盛虞：博士畢業於賓夕凡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任教於紐約市立布魯克林學院（CUNY Brooklyn College）。

陳賜恩：加州大學亞洲研究教授。

顧毓琇（1902-2002）：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賓夕凡尼亞大學機電工程教授，曾任中華民國教育部副部長。

張其昀（1901-1985）：中華民國教育部部長，普渡大學徐立夫教授（Randolph Norris Shreve, 1885-1975）推薦。徐氏為美援臺灣成功大學發展的主要合作人，他特別強調張氏是蔣介石得力助手（Chiang Kai-shek's right-hand men）。

葉公超（1904-1981）：中華民國外交部部長及駐美大使。

郭廷以（1904-197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

李卓敏：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中國研究所所長。

李卓敏的推薦人是艾維斯．史塔（Elvis J. Stahr, 1916-1998），他當時剛退任美國陸軍部長（1961-1962 在任）、轉掌印地安納大學校長（1962-1968 在任）。艾維斯在 1962 年 12 月 7 日寫給普西的信裡指出，李卓敏能操廣東話及普通話，並有任教美國及中國大學的經驗，頗受學生歡迎，他

105 Charles Morris to Sir Robert Black, 7 June 1963 , NA, BW 90/56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美國同事、在美華人學者都對他愛戴有加。[106]

經過半年的來往磋商，獲甄選進入最後名單的是李卓敏與香港大學數學系教授家黃用諏（1913-2004）。值得注意的是，黃氏並未列名前揭的 9 人名單。黃氏與英國關係密切，他在遴選階段一直是英國當局及港府最屬意的人選。黃、李同為廣東籍，他在中山大學取得理學士學位，獲中英庚款獎學金資助，負笈倫敦大學，於 1940 年及 1947 年先後獲得哲學博士及科學博士，也曾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麻省理工學院、賓夕法尼亞大學及芝加哥大學進行短期研究。黃用諏自 1948 年起出任港大數學系系主任、工程學院院長，1959 年至 1963 年出任香港專上學院統一文憑委員會主席，與新亞、崇基、聯合、浸會、珠海等各院校多有聯繫及合作，對私專運作及院校間的關係、辦學情形了解甚深。他獲得中文大學臨時校董會主席關祖堯及副主席利銘澤（1905-1983）賞識，公推為最佳人選。然而，黃氏後來卻致信港督主動退出。遴選名單上，僅餘李卓敏一名候選人。[107]

李卓敏出生於廣州，在當地接受基礎教育，及長留學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攻讀學士、碩士及博士，後來也於原校任教。李氏的籍貫或出生地、美國教育背景以及中共研究專家這些特點，都比港府最屬意的黃用諏更合乎條件。此外，李卓敏曾於抗戰期間代表國民政府前往美國、加拿大及英國考察經濟建設，又於二戰結束前夕代表國民政府出席在美國舉行的布列敦森林會議（Bretton Woods Conference），共同商討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聯繫匯率及國際貨幣金融。[108]他也在戰後出任國民政府善後救濟總署（救總）副署長、駐聯合國亞洲暨遠東經濟委員會常任代表、行政院善後物資保管委員會主席等職務。[109]這些經歷，基本上

106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December 7, 1962, Records of the President of Harvard University, Nathan Marsh Pusey, 1953-1971, UAI 5. 169 Box 294, 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s.

107 Confidential Telegram, Sir Robert Black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14 August 1963, NA, BW 90/569.

108 Hamilton, “The Turning Point,” p. 129.

109 金耀基，〈敬悼香港中文大學創校校長李卓敏先生〉，《中文大學校刊》1991 年春・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都屬於戰後美國主導下的各種救援及政經秩序重建工作，使他與美國軍政人物有不少合作交流的機會，並獲得肯定與稱譽。[110]

李卓敏於 1951 年離開中國，出任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工商管理學教授，並兼任國際商業系系主任、中國研究所所長，以及聯合國人口委員會與統計委員會委員。他在美期間的出版著作，專門針對中共管治下的中國經濟、統計學與工業發展，計有 1959 年的《共產中國的經濟發展》、1962 年的《共產中國的統計制度》諸書，為當時少有的學術研究成果。這些公職、教席與行政職務、學術著作，不但反映了他與美國緊密的關係，他的學術研究領域也切合美國高度關注的戰略意義——自韓戰以來，將香港設定為蒐集中共經濟情報和觀察中國政治動向的窗口與據點。[111]由此觀之，黃用諏有其鮮明的英國教育背景，而李卓敏則有深厚的美國教研背景。但是，李卓敏具備的國民政府乃至國際機構工作的豐富經驗，遠非黃氏所能比肩。此外，李卓敏即使已遠離國民政府官場，但對香港政治環境的了解，仍比純粹作為學者的黃氏深刻。

1959 年，李卓敏在美國已與從香港而至的第三勢力領袖顧孟餘（1888-1972）飲宴來往。[112]第三勢力又獲得中情局外圍組織的亞洲基金會支持。[113]從下文論述可見，李氏為亞洲基金會及第三勢力在香港的活

卷（香港），頁 3。

110 李卓敏出任的救總同時向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負責，而該署署長是美軍將領魯克斯（Lowell Ward Rooks, 1893-1973），兩人交誼不淺。據說李氏與 12 名同僚在職期間同遭指控貪污舞弊，但他最後無罪獲釋，可能與魯克斯致函法庭，高度讚譽李氏功績有關。〈行總舞弊案，李卓敏等九名下不起訴處分〉，《華僑日報》，1947 年 12 月 20 日，1 張 1 頁；〈李卓敏被控案下不起訴處分，魯克斯致函表彰工作，李現應聘將赴美講學〉，《工商日報》，1948 年 1 月 15 日，頁 2。

111 麥志坤著，林立偉譯，《冷戰與香港：英美關係 1949-1957》，頁 35-40。

112 黃克武，《顧孟餘的清高》，頁 292-293。

113 關於亞洲基金會與中情局的關係，以及該會對 1949 年南來辦學的知識群體、香港第三勢力的資助，見傅葆石，〈文化冷戰在香港：《中國學生周報》與亞洲基金會，1950-1970（上）〉，《二十一世紀》第 173 期（2019 年 6 月，香港），頁 47-59。亞洲基金會對第三勢力的具體資助情況，另見於陳正茂編著，《50 年代香港第三勢力運動史料蒐秘》（臺北：秀威資訊公司，2011），頁 48。

動擔任顧問，雙方關係自是匪淺，對於香港政治複雜性的了解異於一般人。更重要的是，李氏是富爾敦委員會中「唯一一位兼具中國與西方學術背景，並已經與香港各界建立良好關係的華人」，這一身分的獨特性無人可及。在他後來的下屬、1966 年入職中大並升任至大學秘書長的陳方正的筆下，李卓敏被譽為「眾望所歸」。[114]

然而，這種後見之明不能充分反映李卓敏在獲委任過程中，港府對他的實質評價。李卓敏雖兼通中西文化、辦事能力強、擁有美國人身分並位列委員之職，卻沒有在遴選階段成為其當選的優勢。根據英國殖民地教育顧問郭克時（Sir Christopher Cox）寫給該部教育事務官員卡特的信函顯示，雖然李卓敏的個性及能力受到肯定，但富爾敦向港督柏立基明言李卓敏出任校長一職是絕對不合適(definitely unsuitable)的。[115] IUC 秘書麥士威（I. C. M. Maxell）認為李卓敏在香港當地雖是名人，並且有親人居港，但質疑他欠缺管理大學的經驗，不了解英國大學的行政文化與教育體系。[116]

IUC 主席莫里斯於 1962 年 12 月 20 日寫給柏立基總督的信函中，李卓敏、陳賜恩、郭廷以已從 9 人名單中移除，由普西新推薦的 7 人取代。這 7 名學者皆具備臺灣背景，[117]他們或曾在美國接受教育，又或者與美國機構有緊密的合作關係：

張　丹（1912-）：曾於美國接受教育，時任臺北科技學院校長，曾任省立成功大學工程學院院長。普渡大學徐立夫教授推薦。

Hsian, Jung-chu'uan：時任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政治學教授，中文名及生卒年不詳。聖路易華盛頓大學校長 Thomas H. Eliot(1907-1991）推薦。

114 陳方正，《與中大一同成長》，頁 31。

115 Sir Christopher Cox to W. S. Carter, 10 December 1962, Appointment of Vice-Chancellor for New Chinese University in Hong Kong, 1962-1963, NA, CO 1030/1099.

116 I. C. M. Maxell to Dr. K. Mellanby, 22 January 1964, NA, BW 90/569.

117 Charles Morris to Robert Black, 20 December 1962, Appointment of Vice-Chancellor for New Chinese University in Hong Kong, 1962-1963, NA, CO 1030/109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郭平賈（1918-）：時任南伊利諾大學歷史系教授，哈佛大學博士。聖路易華盛頓大學校長 Thomas H. Eliot 推薦。

李熙謀（1896-1975）：曾在美國接受大學教育，時任臺灣教育部常務次長。徐立夫教授推薦。

劉　真（1913-2012）：時任臺灣省教育廳長、臺灣師範大學校長。徐立夫教授推薦。

梅貽寶（1900-1997）：曾任燕京大學校長、時任愛荷華大學東方學教授；在美國接受教育。威斯康辛大學希爾（Henry B. Hill）、衛斯理大學校長巴特菲爾德（Victor L. Butterfield, 1904-1975）、耶魯大學耶魯學院院長迪凡（William C. DeVane, 1898-1965）聯名推薦；巴特菲爾德高度稱讚他「是最為讓人印象深刻的人」。

吳大猷（1907-2000）：時任加拿大國家研究院理論物理組主任。耶魯大學校牧（chaplain）兼雅禮協會副主席羅維德推薦。

1963 年 6 月，莫里斯向柏立基說明過去沒有把李卓敏列進推薦名單的原因。首先，李卓敏的條件不如他所提及的其他候選人優秀；其次，富爾敦爵士對李氏是「嚴重質疑」（serious doubts）的。莫里斯坦言他對李氏為人難以作出評論。[118]

「富爾敦委員會」除了富爾敦及李卓敏外，還有 IUC 秘書麥士威、里茲大學教務長羅治（J. V. Loach）、劍橋大學教授楊格（F. G. Young）、馬來亞大學教授湯壽伯（Thong Saw Pak）。「富爾敦委員會」的英國成員對於香港的臨時校董會華人委員選出李卓敏不以為然。臨時校董會共有 9 人，華人委員佔 6 席，分別是：主席關祖堯、錢穆、鄭棟材、容啟東、利銘澤、李曹秀群（1908-2005，市政局議員兼香港首名女性立法局議員）。羅治向麥士威坦言，對於李氏的當選感到心情複雜（have mixed feeling）。[119]然而，當李卓敏成為中大校長已成鐵定事實，他們所能做

118 Charles Morris to Sir Robert Black, 7 June 1963, NA, BW 90/569.

119 Letter, J. V. Loach to I. C. M. Maxwell, 11 November 1963, NA, BW 90/56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就是大方祝福他愉快勝任。[120]

李卓敏當選的原因，過去很少受到注意。但從英美有關當局所共同認可的校長人選三大條件而言，李卓敏完全符合，他雖以次選的姿態進入最後遴選名單，但他得以作為富爾敦委員會唯一的美籍華人委員，或許已反映港督以上層面的倫敦主事者與美國方面（甚或如註 123 所說的高至英美兩國元首）達成了某些共識。有趣的是，李卓敏到香港出席富爾敦召開的專家委員會，旅費並不是由港府支付，而是美國的亞洲基金會負責，他也以基金會名義留港完成其他任務後才返美。[121]

與經費有關的另一件趣事，就是港府對於李卓敏的薪金補助斤斤計較、舉棋不定，要多次與英國殖民地部書信來往磋商。殖民地部要求柏立基親函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校長，請求對方批准李氏借調香港三年，並為其釐定工資標準。相關薪金，必須按照當時美國大學校長的工資水平計算。不過，港府只支付李卓敏的基本工資，超出的補助（top-up）則由雅禮協會或亞洲基金會解決。殖民地部官員建議柏立基聯繫當時主管新亞財政的蕭約，指出如獲對方協助，會很有利於大學的發展前景。[122]結果，「在倫敦與華盛頓政府的力促之下」，加州大學「史無前例」給予李氏「十年的特假」。[123]同時，李卓敏每年 7,000 美元的額外校長薪

120 Letter, I. C. M. Maxwell to Li Choh Ming, 11 November 1963, NA, BW 90/569.

121 I. C. M. Maxell to C. R. C. Farran (Colonial office), 21 June 1962,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NA, BW 90/558, 1962.

122 Confidential Telegram, Selection of Vice-Chancellor,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to Hong Kong (Sir R. Black), 27 September 1963, NA, BW 90/569.

123 「史無前例」一語，為曾任中大副校長、校長的金耀基在 1991 年李卓敏追悼會所云。見金耀基，〈敬悼香港中文大學創校校長李卓敏先生〉，頁 3。此外，金耀基在中文大學慶祝創校五十周年的訪談中，更指李卓敏的「十年」假期，是由英國女王親自致函美國總統提出，美國總統再透過加州大學系統的主席向柏克萊大學校長提出相關安排。參見〈「中大五十・人」——創校先賢李卓敏〉，《香港中文大學五十周年》網站（https://www.50.cuhk.edu.hk/zh_tw/cu50thepeople/VCLi），影像見中大校方網上錄像分享平台《中大視野》，2013 年 7 月 19 日發布，2022 年 2 月檢索，https://cutv.cpr.cuhk.edu.hk/detail/342?t.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津補助由亞洲基金會支付，名義上為顧問服務的報酬。解決薪酬補助問題後，柏立基才發出委任信給李卓敏，邀請他赴港上任。[124]

李卓敏的顧問工作之一，是擔任由亞洲基金會資助的「友聯研究所」（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URI）顧問委員會主席。友聯研究所由香港的「第三勢力」創辦，營運經費由亞洲基金會提供。[125]李氏出任中大校長後，與中國研究專家弗朗茨·舒曼（Prof. Franz Schurmann, 1926-2010）、鮑大可（Dr. Doak Barnett, 1921-1999）及史丹福大學胡佛學院東亞藏書館長吳文津（1922-2022，1965 年曾任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館長）組成這個委員會。他們頻繁在港見面，為友聯研究所的發展方針提供意見。[126]

上述事例可能只是微不足道的瑣碎小事，卻頗為耐人尋味。首先，由中情局資助之亞洲基金會提供的教授補助，不禁讓人聯想到「學術性行動計畫」中，對於教師、教授這類擁有「發達頭腦」（the developed mind）的知識菁英（intellectual elite）及社會輿論領袖（Opinion-moulding leaders）的資助方針。[127]其次，讓人不解的是，港府有能力撥付新大學 1,000 萬港元建校經費，英國殖民地發展及福利基金（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Welfare Fund）也慷慨捐助 400 萬港元啟動經費，[128]要解決一校之長的區

124 Election of Vice Chancellor, Copy of Confidential Telegram from Sir Robert Black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26 October 1963, NA, BW 90/569.

125 友聯研究所為友聯出版社所經營，主要工作是搜集與中國有關的剪報、地方出版物等，為世界各地學者提供研究中國的材料。有關友聯出版社及友聯研究所等屬下組織（黃克武、余英時語：友聯集團）與第三勢力的關係，參余英時，〈香港與新亞書院〉，頁 125-146；黃克武，《顧孟餘的清高》，頁 234、248-250；區志堅著，古谷創譯，〈自由なくして生きる道なし——一九五〇年代の香港と『自由陣線』〉，收入中村元哉編，《憲政から見た現代中国》（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8），頁 269-294；傅葆石，〈文化冷戰在香港：《中國學生周報》與亞洲基金會，1950-1970（下）〉，《二十一世紀》第 174 期（2019 年 8 月，香港），頁 67-82。

126 參見 A Proposal Submitted to Rockefeller Brothers Fund by The Asia Foundation,"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Henry Kissinger to Rockefeller Brothers Fund president Dana Creek, White House, November 24, 1969, CK 2349576377.

127 The U.S. Doctrinal Program, PSB D-33/2.

128 Proposed Chinese University: Development and Finance, 17 April 1961, NA, CO 1030/1093.

臺灣人文與藝術期刊資料庫

區薪金補助，毫無疑問也是綽綽有餘的。除非英美之間有某些協議，並涉及以共同負擔經費的形式支付校長薪金，否則實在很難理解民生日趨富庶的香港何以為此要多番與英美反覆磋商。

四、以國際化為名的「美國化」大學

（一）「所謂『國際』就是美國的代稱」

1963 年 10 月 17 日，中文大學正式成立。校監柏立基總督在典禮上闡釋了中大命名用意及肩負的時代使命，期望中大發揮香港作為中西文明交匯的城市特質，採用貼近本土社會的中文作為教學語言，為「中文中學完成教育的學生提供大學教育」。他毫不諱言指出，中大的成立與香港大學不願提供中英雙語教學有關。[129]同時，港府也期盼中大訓練的人才，能滿足工商業正值起步的香港社會所需。正如《富爾敦報告書》所說，新大學要為學生提供多元化學科訓練，讓他們成為香港社會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員，回應本地對於高度專業化的現代工商業社會需求。[130]

不過，李卓敏上任校長伊始，便把國際化定為最重要發展方向。他的就職典禮致辭，闡明治校綱領是「國際精神」和「國際化」，[131]宣稱中大「不會是一所中國的大學（雖然本港居民百分之九十八屬華人），……它要成為一所國際大學。」[132]他在上任前已按哈佛大學校長普西的建議，

129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auguration Ceremony Address Given by H. E., The Governor,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NA, BW 90/1599.

130 The Fulton Report on a Federal Chinese University in Hong Kong 1963, pp. 2-3. NA, CO 1045/819.

131 李卓敏，〈時代及決心：李卓敏博士就職典禮中致詞〉，《中文大學校刊》第 1 期第 3 卷（1964 年 9 月，香港），頁 2-3。

132 李卓敏，〈大學校刊．題辭〉，收入《中大二十年》（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中大二十年檢討活動委員會，1984），頁 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增聘兩名英美學者為大學校董會成員。[133]他也向普西介紹他剛成立的學術顧問委員會（Advisory Board on Academic Matters）如何體現國際化的特色，說明中大絕不能被「中文」一名所誤導，以為是在研究漢學；中大乃是一所在學科設置上十分先進、多元和國際化的大學——包括物理、數學、生物、化學、東方學、語言學、經濟及政治科學等。[134]

不過，李卓敏的國際化方案，準確來說，不過是更進一步的「美國化」。他在上任之初，雖曾指出會將英國大學制度融入已在不少方面都受美國影響的本地高等教育模式，言下之意是要加強英式教育、減少美國的影響力，但他的首項校政要務，卻是大力推動與加州大學系統的師生交流，加強與美國的合作。[135]他與加州大學的龐大系統簽訂學生交換計畫，放在今天也是一項繁複而不少大學趨之若鶩的事情；它有助提升院校在英美高校排名遊戲中的國際化得分，也是衡量校長治校的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KPI）之一。對於中大這所剛成立一年的大學，它的學生便有機會與美國著名大學互訪一年，並且免費攻讀對方的課程，這是當時的香港大學難望其項背的。[136]對大學國際化持保

133 普西 1963 年出任中文大學的校董，不但在校長人選推薦上發揮作用，也在中大「國際化」發揮影響力。他在李卓敏赴香港就任校長前，向李卓敏建議中大校董會要多囊括西方學者。關於中大學術顧問委員會，兩人也有所交流。李氏抵港後，便建議中大校董會及香港政府修改大學條例（University Ordinance），在校董會額外加入兩名英美學者（President Clark Kerr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nd Director C. H. Philips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見 Li Choh Ming to President Nathan M. Pusey, February 28, 1964, Records of the President of Harvard University, Nathan Marsh Pusey, 1953-1971.

134 Li Choh Ming to President Nathan M. Pusey, February 28, 1964, Records of the President of Harvard University, Nathan Marsh Pusey, 1953-1971; 李卓敏，〈「大學展望：李校長扶輪會演詞」〉，《中文大學校刊》第 1 卷第 1 期（1964 年 6 月，香港），頁 2-4。

135 Note of a meeting between Sir A. Cohen and Dr. Li Choh-Ming at the D.T.C on 28 January 1964, NA, CO 1030/1535.

136 Note of a meeting between Sir A. Cohen and Dr. Li Choh-Ming at the D.T.C on 28 January 196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留態度的新亞書院，也很快遵循中大模式而參與其中。[137]按二校簽訂的協議，中大可推選符合資格的學生前往加州大學系統內的 7 間院校進修，加大亦每年遣送 5 名本科生及 4 名研究生在中大攻讀一年，同時委派 2 名國際著名教授來港教學及專職處理交流事宜。[138]

在學生交流活動上，美國國務院直接策劃了中大師生前往美國交流的各種計畫。早於 1964 年，中大崇基學生會領袖便獲推薦參加美國國務院籌辦的學生領袖活動。美國國務院另再籌辦國際學生會議，出席的中大學生被期待更好地認識美國社會。李卓敏在《中大學生報》指出，中大各學院均鼓勵學生參加這些國際會議及活動。[139]各書院也紛紛選派學生參與「亞洲大學生領袖」研討會；正如前文提及的，各書院與美國新聞署合辦書展，展示美國出版有關遠東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最新書籍。[140]反觀中大與英國的大學即較少建立交流計畫與學生互訪活動。

李卓敏與校內領導層積極尋求國際合作，但所指的「國際」主要局限於美國。李氏親赴美國與傅爾布萊特交流基金會談；聯合書院校長鄭棟材亦應美國國務院邀請赴美，拜會福特基金會、卡內基基金會及亞洲基金會等 30 多所大學與機構，尋求合作及經費資助。[141]中大校刊幾乎每期都刊載哪些高層接受美國國務院邀請前往美國考察的報導。[142]就在中大成立不足一年內，福特基金會便安排了 10 名教師前往美國深造，攻讀高級學位。[143]為中大教員提供前赴美國各大學交流資助的基金還有傅爾

137 區慕弘錄，〈吳校長答美國之音記者問〉，《新亞生活》第 9 卷第 12 期（1966 年 12 月，香港），頁 1-2。

138 〈與加大的交換計劃〉，《中文大學校刊》第 1 卷第 12 期（1965 年 6 月，香港），頁 1。

139 〈選任教授的程序〉，《中文大學校刊》第 1 卷第 2 期（1964 年 7 月，香港），頁 1。

140 〈學院消息〉，《中文大學校刊》第 1 卷第 10 期，頁 4。

141 Minutes of the 10th Meeting of the Council, April 28, 1964, Records of the President of Harvard University, Nathan Marsh Pusey, 1953-1971;〈學人行蹤：鄭棟材院長赴美〉，《中文大學校刊》第 1 卷第 1 期（1964 年 6 月，香港），頁 5。

142 如「校務主任訪英美」，即報導校務主任胡熙德應美國國務院之邀「赴美考察大學行政，為期約三十天」，見《中文大學校刊》第 1 卷第 8 期（1965 年 2 月，香港），頁 2。

143 〈本校第五屆集會大典——長成蓬勃之氣象：大學校長李卓敏博士致詞〉，《中文大學

臺灣大學機構典藏資料庫

布萊特基金、洛克菲勒基金會、卡內基基金會、亞洲基金會、紐約嶺南大學董事會、哈佛燕京學社、雅禮協會及約賽亞美斯基金會（Josiah Macy Jr. Foundations, U.S.A.）。李卓敏指出，在這些基金的捐助下，中大的教職員「得以活躍於國際學術界之中」。[144]

在高級講師到講座教授的招聘事宜上，中大校方在法定文件《香港中文大學規程》公布選任辦法後，另於《中文大學校刊》詳細闡釋「選任教席的程序」。第一道「程序」聲明會在本港及若干英聯邦國家的報紙刊登招聘廣告，並「將是項空缺消息通知美國各知名大學」。[145]前者是報紙公布消息，是相對被動、靜態的資訊傳播；通知美國各知名大學，則包含主動的挖角以及明確邀請的行動，顯示美國的教員或畢業生是中大特別針對的招聘群體。

中大在初創時期於教研經費、師資提升、人才培養乃至校園建設諸方面，均仰賴美國的援助，這使中大體現了美式教育的特性，建立起現代化的先進美式體制，向國際一流大學的方向邁進。不過，對於李卓敏的十年校政發展方針與辦學成就，1970 年代卻有中大學生如此總結：

> 來自加州的中大校長李卓敏亦提出要把中大辦成「國際化」，所謂「國際」就是美國的代稱。[146]

也有中大師生認為中大與港大的差異是如此的：

> 港大是製造小英國人，中大是製造小美國人的大學，……製造充滿美國人意識的大學生。[147]

中大建校十多年後，校方延續美國的教學模式。從三所書院在 1950 年代

校刊》第 3 卷第 3 期（1966 年 10 月，香港），頁 1，李卓敏視之為中文大學「國際合作方針」的標誌；換言之，中大的國際化也就是美國化的代稱，於此亦可見一斑。

144 香港中文大學，《開辦的六年：1963-1969——校長報告書》（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69），頁 54。

145 〈選任教授的程序〉，頁 1。

146 馬鞍山，〈從中大發展看香港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頁 4-7。

147 黃子程、關永圻，〈我們看中文大學〉，收入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編，《中大十年》（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學術部，1973），頁 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發展歷程到 1960 年代初期中大的成立過程，美國因素成為都是顯而易見的。這是美國基金會在戰後香港社會深耕細耘的結果，在冷戰時代深刻影響香港高等教育體系的形塑。不過，本文後續將會指出，雖然美國介入中大建校過程甚深，但並不代表它爭取人心與意志的工作是如其所願般達至。正如上述中大師生的個人觀感，某程度上也如實反映了社會思潮的複雜與多元。

（二）「中大是製造小美國人的大學」

除了從校長人選的選拔、薪金資助到學生課外活動，中大的美國因素顯而易見的例子，還見諸具體的學科課程發展諮詢與系所設立。首先，中大成立後的首批「校外禮物」（Gifts to the University），便是由美國政府及其統治的戰後日本政府所贈送，包括一、美國農業部的研究合約；二、亞洲基金會捐贈聯合書院的設備；三、日本政府贈送書本、獎學金及提供訪學日本計畫。[148]

第一項禮物促成了中大在校內設立第一個研究所，命名為社會人文學科研究所，其下另轄經濟研究中心，於 1964 年 7 月啟動，執行由美國農業部委託、撥備美元 25,000 元（港幣逾 143,000 元）的經濟戰略性調查研究。這個項目由李卓敏親自規劃，目的是要了解香港在長期發展趨勢下對於產品輸入的需求及供應量，並調查香港居民的收入、人口增長情況——「從而預測今後十五年內香港農業產品的供求情形」。[149]隨後，亞洲基金會多次捐款給中大執行研究，[150]美國經援協會則另捐款給聯合、崇基及新亞書院添置教學設施；[151]福特基金會在 1965 年及 1967 年分別捐款 170 萬及 300 萬港幣給中大，提高師資，並津貼教師前往海外

148 Minutes of the 11th Meeting of the Council, May 26, 1964, Records of the President of Harvard University, Nathan Marsh Pusey, 1953-1971.

149 香港中文大學，《開辦的六年：1963-1969——校長報告書》，頁 38。

150 〈各方捐贈〉，《中文大學校刊》第 2 卷第 2 期（1965 年 8 月，香港），頁 7。

151 〈各方捐贈：美國經援協會捐贈〉，《中文大學校刊》第 2 卷第 11 期（1966 年 6 月，香港），頁 1。

臺灣人文學期刊資料庫

進修博士，以及聘請外籍訪問學者在中大擔任顧問。從 1964 年至 1970 年的《中文大學校刊》的「學人行蹤」、諮詢委員或訪問教授「簡介」的專欄，不難看到海外進修或訪學的國家率以美國為主，而聘用的專家、學者、顧問同樣多數來自美國。

獲得美國各基金會的撥款資助，中大不斷開展各項社會科學研究項目、設立學系及研究所與研究中心，如李卓敏所願成為學術研究型的大學。中大的各項研究在當時的香港或美國，都是前沿學科研究領域。相形之下，作為英國老牌殖民地大學的香港大學，1960 年代仍只是教學型大學，同時也較少見到在社會科學領域展開大型的調查與研究。值得注意的是，中大的學術發展，受惠於美國的文化冷戰戰略。

冷戰時期，美國當局著意於大規模培育社會科學的專門人員，目的是要迅速而有效地實現冷戰行動中的各種決策，以便在文化冷戰中致勝。職是之故，人文及社會科學的設置，在當代美國的冷戰政策制定者——特別是心理冷戰政策的制定者手上，深層用意是作為隱蔽的心理宣傳網絡攻堅手段。規劃人文社會學科的冷戰運作功能及功用的具體工作，[152]同樣由心理戰略委員會主持。它的目的是要瓦解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學說體系和理論基礎。相關委員會制定了《冷戰行動中的社會科學研究報告》（Report o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Cold War Operations），建議政府既要大量訓練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人員，也要培訓政府部門的首長及規劃者（Government operators and planners）在進行冷戰工作時，善用社會科學研究的戰略價值，摧毀以馬列主義為代表的共產主思想，在意識形態戰爭（ideological warfare）中取勝。[153]

當美國要在香港實施心理戰略時，推動上述的社會科學建設便是其中一條渠道。獲得華府財政撥備的非官方基金會，捐助中文大學執行各

152 Report o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Cold War Operations, PSB D-32, April 11, 1952, CIA-RDP80-01065A000500080005-0.

153 于群對美國的社會科學學科如何介入冷戰時代，並在文化、心理戰略上發揮功用有深入的研究，見氏著，〈社會科學研究與美國心理冷戰戰略——以「學說宣傳項目」為核心的探討〉，《美國研究》2007 年第 2 期（北京），頁 68-82。

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資料庫

種冷戰語境中的「隱蔽性」文化發展項目。這些項目大致上可歸納如下：

1. 亞洲基金會資助中大成立「新聞系及群眾播導中心」；
2. 亞洲基金會捐款「社會人文學科研究所」，研究香港的鄉村社會情形；
3. 福特基金會支持中大設立「社會調查研究中心」，與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中國學術研究中心」合作，進行「香港都市家庭生活狀況」以及「香港工業對高級人才之需要」的研究；
4. 福特基金會另於 1965 年捐贈美元 295,000 元（港元 170 萬）建立中大研究院，推動研究工作及遣送教職員前往外國深造、聘請客座教授與研究人員；1967 年 3 月再捐款 300 萬港元（美元 51 萬）發展師資、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
5. 洛克菲勒基金會捐助「地理研究中心」，針對香港進行「一項人口問題之重要研究」；
6. 美國政府資助「經濟研究中心」，從事研究香港於 1980 年農產品需求的未來展望研究；
7. 亞洲基金會捐款資助開設「城市研究中心」，「研究本港城市社會結構及其發展情況」。[154]

前文已指出，上述各基金會都與中央情報局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它們也是中情局在香港、亞洲乃至世界各地行動的「掩護機構」、「美國冷戰機器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們對剛成立的中大主動地提供援助，同樣可以置放於冷戰格局下觀察。研究香港的社會經濟結構、產業供應增減、高級或專業人才需求、人口來源與規模、人口社會階層與結構、人均收入、家庭組合及規劃、女性醫療乃至語言使用及文化習慣等，有助於港府制定工商業發展及人力教育政策，但對於撥款機構幕後的美國當局，在窺探中國以制定對華政策方面，更具備實質的政治參考價值。因此，

154 上述引自《中文大學校刊》第 2 卷第 4 期（1965 年 11 月，香港），頁 1-2；第 2 卷第 8 期（1966 年 3 月），頁 1；第 3 卷第 2 期（1966 年 9 月），頁 4；第 3 卷第 4 期（1966 年 11 月），頁 3；第 3 卷第 8 期（1967 年 3 月），頁 1。

臺灣人文學期刊資料庫

這所置身英國租借地新界的新大學，成為美國觀察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發展的前哨站與研究據點。

1960 年代的香港正值工業化發展階段，中大第二所校級研究所「嶺南工商管理研究所」應運而生，由紐約嶺南大學信託基金撥款 63,000 美元（約合港幣 36 萬元）成立，目的是為香港的工商貿易現代化轉型提供系統性的研究及建議，由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佛茨（Franklin E. Folts）於 1964 年 4 月 1 日以顧問身分來港創建。往後兩年，該基金會每年續撥 5 萬美元（約合港幣 285,000 元）。加州大學蒙尼芝（Maurice Moonitz, 另譯作穆念慈）教授出任該研究所首任所長，另有 2 名教授協助所務發展。此外，中大邀請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圖書館學院院長史華克（Prof. R. C. Swank）及吳文津於 1964 年來港，協助籌建圖書館、擬定發展計畫。因此中大圖書館採用「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編排西文書目」，使之「與美國國會圖書館及其他採用同樣分類法的圖書館建立密切聯繫」。[155]他們的來港經費，是由「某些」基金會（certain foundations）資助，而非中文大學。[156] 1967 年，加州大學出版社副主任李連福（Philip E. Lilienthal, 1914-1984）任中文大學顧問，駐校籌創出版部，翌年成立。中大出版部旋即於 1968 年 4 月與「美國新聞署合辦美國大學出版社書籍展覽」。[157]無獨有偶，協助建立圖書館及出版部等舉措，正是「學術性行動計畫」內容之一。[158]

中大校園最早建立的學術單位，還有 1967 年成立的中國文化研究所，其獲資助的研究項目主要來自哈佛燕京學社及亞洲基金會，後者承擔了研究所 1967-1968 年的開支。除了這種圍繞中國歷史、文化等展開的學術研究外，李卓敏在美國國際基督教大學協會（Trans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ristian Colleges and Schools）委託下，1969 年舉辦「亞

155 香港中文大學，《開辦的六年：1963-1969——校長報告書》，頁 51-53。

156 Minutes of the 8th Meeting of the Council, February 11, 1964, Records of the President of Harvard University, Nathan Marsh Pusey, 1953-1971.

157 香港中文大學，《開辦的六年：1963-1969——校長報告書》，頁 49-50。

158 The U.S. Doctrinal Program, PSB D-33/2.

臺灣人文與社會期刊資料庫

洲高等教育專題會議」國際大型研討會，主題是「新社會新人物：大學為改進社會之工具」，吸引印度、印尼、日本、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臺灣、泰國、越南、香港等地共 20 所大學的代表與會。[159] 中大的名聲慢慢由此而顯揚，其學術地位之奠立，則見於別出心裁的學術課程設置。中大分別設定了三個主導大學學科研究發展方向的學術顧問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成立，與哈佛大學校長普西建議中大向國際化發展的方向有關。

中大學術顧問委員會由自然科學委員會、人文科學委員會、社會科學及工商管理委員會組成，共有 19 名委員，來自美國的有 13 名，英國佔 3 名，馬來西亞、義大利及瑞典則各佔 1 名。所謂「國際化」就是「美國化」之說，於此亦清晰展現。這些委員會的學科方向設定，又或者是中文大學各學系、研究所與研究中心專業領域的創建，與冷戰期間美國的前沿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有直接關係；並且體現了「學術性行動計畫」資助學術研討會的方針。

美國的基金會也與社會機構或相關團體合作，廣泛推進各種社會科學研究及具體建設。譬如亞洲基金會在亞洲各國展開的資助項目，包括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下的「鄉村及社群發展、城市發展、科學和技術、傳播與新聞、經濟發展、公共行政，以及文化工作」，透過美援幫助亞洲各國在大學內外進行學術研究與宣傳，推動「地區合作運動」，進而「加速經濟、社會和教育的進步」。[160]亞洲基金會自稱在港活動，特別集中於資助香港的出版業界、援助青年出版物和推動青年活動，補助參加國際會議及交流活動旅費，加強他們與歐美世界的緊密合作，以加深對美國文化價值及生活方式的了解。

新成立的中文大學，沒有老牌殖民地大學的歷史包袱及使命負擔，其創辦的目的既是要為香港社會經濟轉型提供適用人才，遂順理成章地在戰後美援的文化傳統上直接響應及履行美國的文化冷戰方案。人文及

159 香港中文大學，《開辦的六年：1963-1969——校長報告書》，頁 55。

160《亞洲基金會香港分會：宗旨與工作》，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NA, CO 1045/917.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社會科學與商業學科、自然科學的課程建設，讓青年大學生享有大量的出國交流機會以及個人發展機會，都與美國一眾基金會在文化冷戰機遇下提供的平台及援助息息相關。反觀被喻為培養「小英國人」的香港大學，則較少看到亞洲協會或亞洲基金會頻繁的活動身影。[161]

要之，中大成立之初，獲得美國政府及其相關基金會的資助，展開了各種研究所及嶄新課題的大型研究項目，也啟動各種前往美國的師生交流活動。另一方面，中大將校內資源集中於與美國著名大學交流的項目上，透過邀請知名學者出任訪問教授以及不同學術領域的顧問，甚至招聘美國學歷背景的高級學術人員出任常額教席，以提高中大的國際學術水平及聲譽。[162]即使不具備留學美國背景的非教研職系行政人員，在建校後得以登上中大講壇者，不少都與美國在港機構有淵源。譬如被聘為新亞秘書的陳佐舜（1922-2002），在加入中大前的 1959-1965 年間，便曾任亞洲基金會高級設計助理。[163]

五、首批中大校園建築規劃的美國因素

不難看到，從教學人員招聘、師生交流計畫到研究機構設置、行政支援培訓，美國化是中大初創時期的一大特色，這也與美國在冷戰氛圍

161 亞洲基金會也有補助港大學術研究經費、贈書計畫、發展成人教育等等，但金額不大，經濟及文化、政治方面的戰略意味亦不如中大明顯。當中不少是與出版補助有關，也曾資助港大博物館購買一匹唐代陶瓷駱駝，又或者資助聘請一名校外進修課程的專任助教經費。有關資訊可參考：〈亞洲基金會贊助下 港大建築系主任研究東南亞建設〉，《工商晚報》（香港），1957 年 5 月 5 日；〈亞洲基金會輔助港大贈近七萬元輔助研究〉，《華僑日報》，1957 年 2 月 27 日，2 張 3 頁；〈亞洲基金會撥款　補助港大政經系〉，《工商日報》，1957 年 2 月 27 日，頁 7；〈港大組織　教育研究會　由亞洲基金會撥款〉，《工商晚報》，1961 年 4 月 27 日，頁 4；〈港大校外課程部　獲亞洲基金會補助費　聘全日工作專任助教〉，《工商日報》，1962 年 6 月 2 日，頁 6。

162 Minutes of the 12th Meeting of the Council, June 30, 1964, Records of the President of Harvard University, Nathan Marsh Pusey, 1953-1971.

163 〈教職員簡介：陳佐舜先生〉，《中文大學校刊》第 2 卷第 9 期（1966 年 4 月，香港），頁 3。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下推動的文化／心理戰策略有極大的關係。深刻反映此一特色的，還有校園建築。

（一）中大本部校園的第一棟建築物：范克廉樓

1963 年通過成立中大後，臨時校董會著力於建校選址及校園規劃方案，李卓敏於 1964 年 2 月正式上任後便付諸實踐，與他交涉的是港府二號人物輔政司（The Colonial Secretary）戴斯德（Edmund Brinsley Teesdale）。[164]港府當局對中大校園規劃及建築工程的審批程序多有拖延，也許是有意藉此向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個在港勢力宣示港府對第二所大學的絕對管治權。早於 1964 年 3 月，中大委託的建築師司徒惠（1913-1991）即已經規劃出大學會堂、圖書館、行政樓及學生中心（Student Centre）的建築方案和相關經費，[165]但直至 1966 年 3 月，李卓敏還就此方案不斷與港府磋商。[166]港府在涉及行政樓、教學樓及學生活動大樓的建築經費，對中大多有留難，計畫書留中不發、不作回應。

值得注意的是，發展學生中心的倡議，本身即源於希望提供捐助的美國政府。早於 1961 年 11 月，時任美國遠東難民顧問兼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難民和移民處（Refugee and Migration Unit）處長艾偉德（Robert A. Aylward）便向港府呈交提案，表示美國有意向中大捐款興辦學生中心。有關捐款是由美國駐港領事館難民及移民處執行的「遠東難民計畫經費項目」（U.S. Far East Refugee Program）支付。港府將艾偉德的意願轉達中大臨時校董會主席關祖堯，[167]而關氏將之留待李卓敏就任校長

164 輔政司 1976 年後改稱布政司，亦即 1997 年後的政務司（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165 W. Szeto,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evelopment Plan: Preliminary Report*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64), p. 14.

166 The Vice-Chancellor's Memorandum on the Basic Building Programme, March, 1966.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and For-1.Site Formation-2.Individidul Building Schemes Within Main Grant Area, HKRS 156-1-8340.

167 Letter from Lam Chik Suen, 26 October 1961, File No: CR1/2041/61, p. 12.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KRS NO. 457, D-S No. 3-14.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後著手處理。

捐建學生中心的款項由美國政府支付，港府理應只需審批建築方案，校方便可施工。但港府傾向衡量中大校園的整體建築費用後再一併落實，沒有為加快興建學生中心而開「綠燈」。遲至 1966 年初，中大校園規劃仍未核定，學生中心也一併延宕，逼使李卓敏數度致函催促港府，要求加緊批核施工計畫書，以便儘快開工。

正如上述，美國在 1961 年便有意捐助中大的校舍發展。1963 年 11 月——中大成立尚不足一個月，李卓敏獲委為校長的消息正式公布，美國國會已經通過國務院撥款 30 萬美元，用以籌建中大學生中心，再加上亞洲基金會額外支付的 57,000 美元，美國共捐贈金額 357,000 美元，按當時 5.75 匯率計算，折合港幣高達 2,052,750 元。[168]但港府對於興建學生中心的計畫卻再三拖延，遲遲未予審批。為免中大失去美國的巨款資助，李卓敏再度致信催促輔政司，加快審批及釐定 1966 年施工時間表，向美國政府顯示他們亟需這筆撥款的立場。港府終於在 1966 年 4 月回應，但對規劃內容多有保留，並大幅削減預算，變相縮減了港府對中大建築物的開支與承擔。該方案列明的基礎設施被港府歸類為 A、B、C 三大組別，然後依據外來資金捐助的急切性及建物重要性，決定施工次序。A 組最具迫切性，包含學生中心、校際宿舍、行政大樓、中央圖書館、中央科學實驗室等；B 組次之，包括研究生宿舍、大學禮堂、診所、高級學術及行政人員宿舍；可從緩處理的 C 組，則是三所書院的禮堂、教職員宿舍、新亞研究所、神學院及崇基音樂樓等。[169]

中大修訂「基本建築方案」後，再度上呈港府。6 月 25 日港府回覆李卓敏，指出得悉中大已獲美國允諾經費建造學生中心，[170]而這也表示

168 E. J. Fehl (Deputy Registrar) to M. G. Morgan (Assistant Colonial Secretary), “Benjamin Franklin Centre,” 24 July 1967, HKRS 1402-1-103.

169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Basic Building Programme, Enclosure TC Annex B TC XCC (66) 59, Vice-Chancellor Li Choh-Ming to The Hon, Colonial Secretary, 7 April 1966, HKRS 156-1-8340.

170 The Hon. Colonial Secretary to Vice-Chancellor Li Choh-Ming, 25 June 1966, HKRS 156-1-834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大與港府經歷多番交涉後，終於達成正式批核協議，獲得了港府授權於指定地點興建校舍。

1966 年 11 月 2 日，美國駐港總領事芮思（Edward E. Rice）親自把國務院用於「遠東難民計畫經費項目」的 30 萬美元支票交給李卓敏，同行的亞洲基金會代表白安偕（Edgar N. Pike）捐贈 57,000 美元。中大校方指學生中心是「大學新址中之第一座建築物」，完工後將為學生提供社交、文化及康樂各項活動之用。[171]然而，在英國管治的香港土地上建立的公立大學，以美國在冷戰中用於爭取人心的難民援助經費興建校園本部第一幢棟建築物，為這所大學打下了鮮明的時代烙印。一座學生活動大樓，在中大被規劃為 A 級建築物，甚至比行政樓更具急切興建重要性，箇中原因，正是在於興建費用來自急須消化的美國當局「遠東冷戰」財政規劃，反映中文大學乃至香港地緣政治在美國文化冷戰戰線上的關鍵角色。[172]

正如前文提及，美國總統簽署的《香港政策》，具備三大目標，首先要維護香港的自由世界前哨站位置，其次是加強香港作為美國情報計畫基地的用途，第三是在經濟、社會及政治領域藉香港塑造出西方與共

171 〈本校接受各方捐贈：美國人士資助興建大學學生中心〉，《中文大學校刊》第 3 卷第 4 期（1966 年 11 月，香港），頁 1。相關資料另見： Mrs. E. J. Fehl to Mr. M. C. Morgan, 24 July 1967, HKRS 156-1-8340.

172 同樣的捐款項目，還可見於中大校刊裡的「美國經援協會捐贈」項目。即使崇基、新亞及聯合三院已合併為公立大學，該會仍繼續捐助它們發展科學教研之設備。如〈各方捐贈：美國經援協會捐贈〉，《中文大學校刊》第 2 卷 7 期（1966 年 2 月，香港），頁 1；第 2 卷 11 期（1966 年 6 月，香港），頁 1。美國經援協會（CARE）1950-1970 年代期間在香港的工作，包括提供食物救濟、捐資發展高等教育、籌辦圖書館及康樂中心，也向基層社會捐資籌設四個鄉村及漁民村落（如見於香港長洲、大埔、青衣諸地的「美經援村」）等。有關 “CARE” 在冷戰時代人道救援事業的研究，可見 Tony Vaux, “Humanitarian Trends and Dilemmas,”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16, no. 3/4 (June 2006, Oxford), pp. 240-254; Heike Wieters, “Ever tried—Ever Failed? The Short Summer of Cooperation between CARE and the Peace Corps,” *International Journal* 70, no. 1 (March 2015, Toronto), pp. 147-158.

臺灣人學術期刊資料庫

產中國的優劣對照面。[173]建立學生中心的目的及其被賦予的意義，基本上包含了上述目標中的核心精神。校方更以起草《美國獨立宣言》的開國元勛，同時也在文化冷戰中被塑造為美國精神價值代表的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之名，把此一建築物命作 Benjamin Franklin Centre，中文譯名為深具儒家文化特色的「范克廉樓」。這一命名可能是出於美國當局之意；整座大樓從誕生到落成開幕，由「籌建范克廉樓美國委員會」（The America Committee for the Benjamin Franklin Centre）監督下完成，該委員會的名稱，即反映了大樓興建前已經定名。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委員會的名單很可能是美國政府直接選定，並以「Benjamin Franklin／范克廉」名義，由 10 名在港的美國財經、金融、石油能源、航空及保險界別等大集團代表，出任委員會成員。[174]

最重要的是，同樣被視為美國出版之父的富蘭克林，“Franklin” 在美國冷戰宣傳策略中，已成為一個特定品牌，尤其是在出版產業的政治功能被當局發揮得淋漓盡致，為爭取人心、贏取人們的意志賣力。[175]中大的 “Benjamin Franklin Centre” 或 “Benjamin Franklin Building”，與「學術性行動計畫」主張把 “Franklin Publications” 旗下書籍大量出版以策動心理戰，在宣傳美國文化及價值觀上有異曲同工之妙。[176]

「克廉」合乎中國傳統的倫理價值，予學生以自強、自律的育材成

173 NSC Report 6007 on U.S. policy toward Hong Kong, May 9, 1960; Paper regarding U.S. policy toward Hong Kong, June 11, 1960.

174 〈范克廉樓開幕典禮〉，《中文大學校刊》第 5 卷第 7 期（1969 年 4 月，香港），頁 1。

175 Franklin Publications（或稱 Franklin Book Programs）創辦歷史的官方敘述，可見 Datus C. Smith Jr., “Ten Years of Franklin Publications,” *ALA Bulletin* 57, no. 6 (June 1963, Chicago), pp. 507-512. 關於 Franklin Publications 如何在美國國務院與美國新聞署先後運作下展開全球文化冷戰的論述，可見 Amanda Laugesen, “The Franklin Book Programs, Transla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a Modern Global Publishing Culture, 1952-1968,” *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Chronicle* 71, no. 2 (Winter 2010, Princeton), pp. 168-186. 美國在 1950-1960 年代如何在出版、外交及各種援助上實施冷戰戰略的研究，另見 Laugesen, “American Publishers, Books, and the Global Cultural Cold War,” pp. 19-37.

176 The U.S. Doctrinal Program, PSB D-33/2.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德之教。更富象徵意義的是，富蘭克林不僅是開創時代的美國政治家、是勇於打破成規及反抗英國殖民帝國的革命者，也是教育家、冒險家、發明家、科學家、慈善家、外交家、出版家以及成功的作家。他的故事具有普世價值，超越民族及時空。這些都寄予主事者對於這座新大學培育傑出人才的殷切期盼，使學生們在這座建築物進行各種活動、學習生活時，都能以富蘭克林為人生楷模，以開放、獨立、自由、奮鬥、上進及勇毅的精神敢於創新、超越自我——這是一種強調實現個人人生理想以及充滿鮮明個性的文化價值。這與中大校訓、校徽的釋義，以及唐君毅極為著重道德責任與民族認同的教育理念相輔相成。[177]

上述種種大學精神的詮釋，與當時中國極左思潮瀰漫下，把個人視為國家機器中一枚小螺絲釘的意識形態，無疑存在不少差異。同時，英國殖民地部或港英政府當局既容許香港史上第一座華人大學的首幢建築物命名為 Benjamin Franklin Centre，不僅反映了戰後美國對香港方方面面的發展都具有巨大影響力，也體現了一棟建築物的誕生，實有冷戰氛圍下的文化地標意義與特定政治涵意。當然，「范克廉」／班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 代表的精神，即具多元、開放、奮進、創新的意涵，不可與戰後美國因為對抗蘇聯而在世界各地建立帝國霸權的擴張主義完全混為一談。

（二）中大作為冷戰文化地標

中大校園建築群的規劃，校董會最早委託司徒惠。李卓敏上任後，再聘請著名華裔美籍建築師貝聿銘（1917-2019）來港視察，並擔任「大學校舍計畫顧問」。貝氏當時已蜚聲國際，為美國政府、公共及商業機構設計甚具口碑的建築物。[178] 1969 年范克廉樓啟用後，1972 年相繼落成的中大圖書館、中國文化研究所、科學館、行政樓等，皆呈現典型的

177 唐君毅，〈敬告新亞廿二屆大學部及研究所畢業同學書〉，收入《唐君毅全集第 16 卷．新亞精神與人文教育．宗教精神與人文學術》，頁 151-154。

178 〈大學校舍計劃顧問訪港〉，《中文大學校刊》第 3 卷第 4 期（1966 年 11 月，香港），頁 2。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粗獷主義（Brutalism）風格。[179]這些建築物以厚重而龐大的混凝土與鋼筋構成，外觀毫不修飾，給人一種匆促而未完成之感，簡約儉樸，不僅降低開支，也十分切合中大這所「難民大學」前身各書院創業惟艱的歷史形象，直接體現了冷戰時局下中大建築的審美思潮與時代烙印。這在香港建築物中實屬異數，與香港大學精雕細琢的英式建築物也大相徑庭。在校方發展計畫裏佔有極為重要地位的學生中心，也因其所在位置而被喻為開放及便於交流的「市集」（market place），[180]同樣以「粗獷主義」風格面世。

樸實無華的粗獷主義，透現了冷戰氛圍下人們對實用、平等、自由等價值觀的心理追求。李卓敏的闡述，把學生中心塑造為中大師生的公共空間，使之成為培養學生公民意識的教育場域。[181]在這個也被李卓敏稱為各種思想交流及訓練的「實驗室」裏，它有助於宣揚西方價值觀，同時也有助於彰顯文化中國傳統價值觀的思想教育，為青年學生提供不同於共產主義的價值、觀念，藉以實現冷戰策略中爭取人心、抗衡共產主義散播的作用。

結合范克廉樓的興建背景，李卓敏的一番闡述，不難讓人讀出類似的文化冷戰意味——尤其是將之放在 1960 年代中後期社會激烈對抗的動盪局勢下考量，「范克廉樓」在「冷戰香港」誕生的政治意味及其作為「文化地標」的功能，不容忽視。范克廉樓由建築款項磋商到建成的 1960 年代中後期，正值香港百年歷史變動中的關鍵時段之一。戰後十年內，香港人口激增逾 200 萬人，社會變得異常複雜；因應美國禁運措施，香港經濟轉型與內地大大小小政治運動，均直接影響香港，致使在地社

179 探討中大本部建築群粗獷主義風格的文章，可見 TZ the Queer，〈中大早期建築興衰史〉，2012 年 2 月 9 日更新，2021 年 12 月 16 日檢索，https://site.douban.com/141457/widget/articles/6785224/article/16652009/; Oliver Elser，〈探尋香港粗野主義建築〉，《M＋雜誌》，2021 年 3 月 10 日，2021 年 12 月 16 日檢索，https://www.mplus.org.hk/tc/magazine/in-search-of-hong-kong-brutalism/.

180 Szeto,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evelopment Plan*, p. 8.

181 香港中文大學，《開辦的六年：1963-1969——校長報告書》，頁 63。

臺灣人文與學術期刊資料庫

會內部矛盾顯露，各方勢力衝突頻傳。美國當局不斷檢討《香港政策》，關注香港的局勢發展，並強化於 1950 年代初制訂的兩大方針：局勢一旦惡化，便迅速啟動美國國民及領事館的撤退方案；同時要加緊利用香港，作為反共產主義的情報搜集及宣傳基地。

最能體現美國對港政策的實用主義與利己思維的，莫過於戰後香港最為動盪的 1967 年。當年 4 月底至 5 月初，爆發了「反英抗暴運動」／「六七暴動」。5 月中旬，有關事件因獲北京當局支持，社會迴響更大；香港內部騷亂加劇，並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民眾於大街小巷引爆土製炸彈，向港府示威。北京當局在國內動員 50 多萬人遊行，聲援香港的「反英抗暴」運動，國務院總理周恩來（1898-1976）也出席了大會。鑒於中國當局的態度及香港社會暴動轉趨激烈化，時任美國國務卿魯斯克（Dean Rusk, 1909-1994）向在港總領事館發出緊急指令，嚴禁「釋出任何有關美國會介入香港軍事行動的假象」，強調美國不會為了英國而在香港與中共發生任何武力衝突，只會繼續利用香港擴大宣傳美國價值觀，務求於中美意識形態鬥爭中獲勝。故美方又要求在港的美國基金會及非政府組織與英國配合，努力做好思想、文化的冷戰工作：

> 由於在香港能接觸到出版物、難民、大量旅遊人士以及取道香港以進出中國的外交人員，美國可利用它作為搜集共產中國情報的主要據點，美國對於中國情報搜集的努力絕大部分是緊密地與英國合作進行。香港是少數能讓美國進入華人日常生活世界的地方之一，我們利用這個機會，透過美國新聞署、文化事務項目、中國難民人道援助項目等等建立連繫。很多美國志願機構參與了後者的援助。[182]

根據美國支付香港社會機構活動經費的 1967 年度財務報告，美國官方及聲稱主要由志願團體捐贈的「遠東難民計畫經費」，針對香港的中國難民援助、輔導與引導、逃難學生獎學金、衛生基建、藥物照顧、職業訓練等撥款高達 40 萬美元。其中最大一筆款項是 30 萬美元，寫明是用於

182 Contingency Planning for Hong Kong, pp. 11-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捐建中大學生中心。[183]誠如後來升任中大副校長、校長的金耀基所說：「1967 年的動亂，幾乎使不足四年的稚齡大學夭折」，李卓敏當時展現堅毅不拔的精神，爭取社會及港府對中大辦校的支持，由此而「向世界表達對香港前景的信心」。[184]

在 1960 年代中後期「文化大革命」的極左思潮衝擊下，處於動盪時局下的中大，正在展開大型校園建設工程，別具時代意義。至少從表面上來看，英美兩國齊心合力推動香港的高等教育事業發展。1967 年 12 月 9 日，中文大學校園本部舉行動土典禮，由香港總督兼大學監督戴麟趾（Sir David Trench, 1915-1988）與美國駐港總領事馬丁（Mr . Edwin Webb Martin, 1917-1991）主持，馬丁並為范克廉樓安放奠基石。李卓敏發表演說：

> 本大學校舍的第一塊基石，係為范克廉樓安置，這是很適當的。范克廉為實行家、哲學家、科學家和政治家。他愛好青年人。我們第一座校舍，主要是供學生作文化、社交和體育活動之用的。本人相信，除圖書館和實驗室之外，它將會成為本大學學生的生活中心。范氏富於智慧、學識和幽默感。……本人深望，范氏的幽默感將從這個學生中心散播開來，鼓舞我們的日常生活，啟發我們的判斷力。幽默乃表示我們互相了解，互相敬重，互相信賴。[185]

「互相了解，互相敬重，互相信賴」之言，結合 1967 年春夏之交造成社會嚴重撕裂的大型社會暴動與范克廉樓學生中心的籌建，或可看出它在香港變動之際被中大官方賦予的時代意義與社會教化功用。它除了讓年輕一代從范克廉的人生故事引伸出匡正時弊、改造人心與意志的思想教導；同時，也要在香港經歷大動亂後，用以顯示乃至強化英美兩國的同盟關係。

---

183 Political-military contingency study of Hong Kong, p. 52.

184 金耀基，〈敬悼香港中文大學創校校長李卓敏先生〉，頁 5。

185 〈本大學新校址舉行動土典禮〉，《中文大學校刊》第 4 卷第 4 期（1968 年 1 月，香港），頁 1-2。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除此之外，中大校園內還有兩座「T」字型而類似巨型「華表」的水塔，與正門口的兩對代表中華圖騰柱的「華表」/「謗木」遙相呼應。同時，與華表構成中國元素的還見於校徽與校訓。以金紫雙色繪製而成的「鳳」圖校徽，期盼「南方的鳥」為香港帶來「太平」、「富強」——「重演一次『鳳凰來儀』的盛事」。[186]出於《論語》的「博文約禮」校訓，寄意中大學生德智兼優，窮究天下知識學問，並敏於踐行——以「崇揚中國傳統文化滙通世界共同潮流為主旨」。[187]

然而，我們不宜忽略的是，中大校園率先樹立起紀念美國國父的大樓，是戰後美國高度介入香港社會教育領域的實例之一。它也反映了戰後 / 冷戰香港時局下英美兩國的微妙關係。范克廉樓的落成，反映港英政府向美國協助專上教育、幫助戰後香港社會重建的致意，另一方面則是說明了美國文化冷戰策略的無遠弗屆、美國政治勢力對英國的壓抑。范克廉作為曾經反抗英國的革命之父，他的名字見諸新大學的首棟建築物，顯示美國「反殖民」的新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在戰後世界的勝利。

六、各行其是：民族主義、殖民管治與文化冷戰

在政治意識形態對峙的年代，美國發動文化冷戰，在中文大學與香港社會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美國從中大校園的基礎建設到課程發展、交流活動都給予大量援助，在學術知識架構的建設工作上，無疑是重要推手。但是，有關工作未必能如美國所願，一一收獲在地化發展的諸種理想成效。美國要爭取年輕學生或南來知識分子的人心（heart）與意志（mind），還是十分不容易的。不論左派或右派的在港知識菁英，皆對民族主義各有所懷，很難受到外力動搖。不同思想背景或政治立場的人面對國族意識與民族文化認同時，仍然各行其是。更何況，香港在

186 〈中文大學的校徽——鳳〉，《中文大學校刊》第 1 卷第 1 期（1964 年 6 月，香港），頁 1。
187 〈大學校訓——博文約禮〉，《中文大學校刊》第 1 卷第 1 期，頁 3。

臺灣人文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97 年以前的管治權牢牢掌握在英國手上，港英政府如何處理冷戰期間美國在港的反共活動，如何制衡左右兩派的政治鬥爭，自有其一套因勢利導的嫻熟手腕。

（一）種瓜得豆：美國與中大的民族主義

美國對抗蘇聯與對付中共的目的、力度與手段各有不同，與中共建交的英國也難以在港完全配合美國，展開對付共產主義的冷戰策略；更重要的是，對於美國在戰後扮演的強權角色，以及在亞洲挑起的戰禍、對中國國土與民族利權的侵害等等，引來學生群體的批判與反彈。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出版的刊物或是在范克廉樓內活動的中大學生，均有大量圍繞 1970 年代保釣運動、越戰的反美言論。如《中大學生報》的「越戰——回顧與前瞻」專輯，在分析越戰後的世界局勢時，便把打著「為了保衛越南的自由民主而來的」美國，斥為人類歷史上最嗜血的戰爭販子，並將越南反抗美國的侵略視作對自由、生存、尊嚴、國土完整、民族獨立而戰；同時，也把美蘇兩個帝國主義斥為人類戰爭的禍源，呼籲時人警惕、提防兩個帝國的意圖。[188] 1973 年以來持續數年的中國週，中大學生會組織大陸尋根團，也舉辦連串講座、展覽及座談會，加深青年學生認識中國。「放認關爭」——放眼世界、認識中國、關心社會、爭取權益，以及「認祖關社」——認識祖國、關心社會，成為 1970 年代學生運動及認同運動的主旋律，[189]這也反映戰後嬰兒潮成長的年輕一代大學生，帶著浪漫主義，充滿理想與改造社會的熱情。

中大老一輩教師群體的反共政治立場，延續著國內已有的「國共相爭」思想框架。雖然他們的觀念在學生群體中看來傾向保守或落伍，但在他們自身的主體價值下還是存在轉圜空間，只要中共重新認可中國傳

188 何之，〈談越戰後的局勢〉，《中大學生報》第 7 卷第 3 期，1975 年 7 月 10 日，頁 2；翱翔，〈誰點起三十年戰火？〉，《中大學生報》第 7 卷第 3 期，頁 3。

189 〈學聯中國周活動介紹〉，《中大學生報》（中國周特刊第 1 期），1975 年 10 月。（該期不設頁碼）

臺灣大學圖書館授權資料庫

統文化價值，彼此仍然可以握手言和。中大首任文學院院長唐君毅，在聽到四人幫垮台後，便向學生說「一旦中共政權變得開放，你們大可回到大陸教書，提倡人文精神」。在唐君毅辭世前一天（1978 年 2 月 1 日），從報刊得悉大陸有人為孔子翻案，便命學生將其著作檢出兩套，分別寄送母校北京大學與南京大學圖書館，並附以信函自作介紹。[190]這大概反映民族主義者視國家與民族文化優先於一切的思想趨向，而民族主義往往又是最難打破或摧毀的思想堡壘。

對於唐君毅、錢穆那代充滿人文理想及民族文化情懷的南來辦學者而言，傳承民族歷史文化的理念及責任感是其辦學目的。外來資助讓他們得以延續已經開展的學術、文教事業，至於是否符合援助機構的期望，並非辦學者關注所在。正如前述錢穆回答雅禮協會代表時，他還表明「辦學自有宗旨，決不專為反共」；新亞接受資助，但也「決不成一教會學校」而「委屈教育原則」，它有自身關於教育精神的追求與意義詮釋。[191]職是之故，香港高等文教事業被推動發展時，不只英國殖民地政府與新亞書院之間存在著論者所謂「同床異夢」的認知差異，[192]美國與港府之間、或者它們與南來者之間，彼此也都可能「同床異夢」，各行其是。

這種「同床異夢」的現象，在中大學生群體裏也清晰可見。在冷戰氛圍的美援文化下成長的年輕一代，他們建立國族主體性、獨立性的連串論述，反映出獨特的思想趨向與民族文化認同，說明美國文化冷戰爭取人心與意志的侷限性。如後來出任中大教授的陳特，他在 1972 年總結學生運動（包括保衛釣魚台運動、爭取中文法定語文合法化運動以至於「反殖民運動」）形成時，認為這是大學生自主自覺，走出「自我的圈子，共同承擔中國人的光榮與苦難，共同開拓中國的新道路新方向」，

190 分別見諸臺灣版及大陸版的《唐君毅先生年譜》，兩者各有詳略。唐端正編撰，《唐君毅全集第 29 卷．年譜》（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頁 194；何仁富、汪麗華編撰，《唐君毅全集第 34 卷．年譜》（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頁 335。

191 錢穆，〈新亞書院（續一）〉，頁 264；唐君毅，〈新亞的過去、現在與將來〉，頁 159。

192 周愛靈，《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頁 284。相關論述另見陳學然、張志翔，〈文化冷戰：美國對香港高校的交流計劃〉，頁 214。

這說明了大學生自證「身體內仍然流著中國人的血」，「脈搏仍然跟中華民族的大生命一起跳動」。[193]

在「流亡」大學成長的青年，他們的國家認同與文化意識值得注意。《中大學生報》反映年輕一代對於身為中國人意識那麼的強烈，與其所處的時代環境有關。一方面，他們感受到港英政府管治下的諸種社會與生活不公，導致反抗英美「殖民主義」及「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情緒不斷累積。另一方面，他們也被文化大革命「改造中國」的政治熱情所熔化，再加上全球反殖、反戰、反帝思潮瀰漫一時，因而對祖國充滿想像與尋根、探索的熱情。這些都讓他們因為「保釣運動」及「認同運動」而走向美國文化冷戰的對立面，[194]同時也打破了港府建立的去政治化社會管治模式，更使他們質疑師輩在政治與民族文化上的保守態度。劉美美寫給新亞書院校長及教師的公開信〈哭新亞〉，擲地有聲，[195]表現火紅歲月裏的學生輩在政治立場、家國文化及教育理念上的各種看法，已經與師長、校方漸行漸遠。

中大建校後 10 年，學生群體的反美情緒顯示，他們對校方的美國色彩，存在一定的疏離感。《中大學生報》嚴辭批判美國發動越戰乃包藏禍心，打著「自由民主」的旗號，行其侵略之實，目的是為了奪取越南的天然資源及戰略位置。[196]又有文章揭露美國發動越戰的目的，是要把矛頭對準中共，並透過「以『反共、保衛自由、民主』為藉口的骨牌理論」長據東南亞與東亞，[197]一切都只是為了維護美國自身的國家利益，沒有任何正義可言。至 1970 年代中期，已有中大新亞書院的學生認識到亞洲基金會作為美國在香港文化冷戰隱蔽機構的戰略意圖：

193 陳特，〈香港學生運動的根源，問題與方向〉，《中大學生報》第 4 卷第 8 期，1972 年 8 月 27 日，頁 1。

194 新亞書院學生會出版部，〈社論：我們的態度〉，《新亞學生報》，1972 年 4 月 1 日，頁 1。

195 劉美美，〈哭新亞〉，《新亞學生報》，1971 年 9 月 9 日，頁 1。

196 何之，〈高天寒流湧，大地暖風吹——談越戰後的局勢〉，《中大學生報》第 7 卷第 3 期，1975 年 7 月 10 日，頁 2。

197 翱翔，〈誰點起三十年戰火？〉，頁 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美國通過亞洲基金會、福特基金會的組織滲入大學，美國販賣其文化形勢洶湧，如友聯便是屬亞洲基金會的，友聯對我們的影響，包括幼年看《兒童樂園》，中學看《中國學生周報》，大學看《大學生活》和《祖國月刊》，它把我們從小到大思想成熟的時期完全佔領。[198]

由上觀之，中大學生的「心與意志」並未因美國冷戰的隱蔽性機構十數年來的慷慨饋贈與大量援助，而被改造，他們在「要做頂天立地的中國人」的認知下，提出不「做低頭屈膝的假洋人」言說。在這種情況下，「批判立場」與「思想自由的立場」，反使他們拒絕二元分立地看待中共與西方之別，毛澤東甚至成為他們筆下的「偉大人物」、「民族主義者」。[199]在他們的「多元」、「批判」性視角下，美國總統艾森豪的解放亞洲政策，就是一場為了搶奪資源而發動戰爭的「深謀遠慮」戰略，而「反共，保衛自由、民主」不過是「美帝國主義」的一套說辭，無法掩藏冷戰、熱戰的真實目的。艾森豪以下這段話，引發他們反感，並對美援有所警惕和保留：「當美國決定把四億美元用在戰爭上的時候，我們並不當作這是一個消費計畫，我們是用最廉價的方法去防止發生危害美國的事。」[200]對美國援助的目的與政治本質的認識，反而讓中大學生加強了對中國的認同感——儘管有不少是出於對祖國、民族文化的想像。

質言之，美國「爭取人心與意志」的冷戰策略，於在地付諸行動後，是否能夠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不無疑問；美國扶持中大成長，最後有可能是「種瓜得豆」。[201]

（一）殖民管治與冷戰棋局下的中大

在前文裡，我們看到了李卓敏主政中大的十五年期間，大量招聘美

198 〈校友如何看中大〉，《中大學生報》第 7 卷第 2 期，1975 年 4 月 20 日，頁 3。

199 新亞書院學生會出版部，〈社論：我們的態度〉，頁 1。

200 艾森豪的話轉引自翱翔，〈誰點起三十年戰火？〉，頁 3。

201 「種瓜得豆」的概念借自張仲民《種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閱讀文化與接受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一書的書名。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國教授，並安排美國背景的教授參與各個學術委員會，而中大幾乎所有的研究所、研究中心乃至一些新成立的學系、圖書館、出版社，都是聘請美國教授來港創立。如果我們認為亟欲贏取文化霸權、重建戰後治港威權的英國或港府對於美國在中大的各種介入不聞不問、無動於衷，則不免低估了英國人管治香港的智慧、能力與政治敏感度。

1964 年，就在中文大學成立後數月，港英政府成立由港大、中大校長與教育司、本地華商領袖組成的「香港特別高等教育委員會」，主要任務是為香港制定一套中長期經濟發展政策，直接左右大學教育方向及資助的釐定準則。1965 年 1 月 5 日至 1 月 30 日，港英政府邀請 1951 至 1957 年曾任英國大學資助委員會秘書、主理該會戰後發展的夏爾（Edward Hale）訪港，制定《夏爾報告書》。[202]《夏爾報告書》在一定程度上具體落實富爾敦以財政預算控制院校的理念，並且釐定執行的方法和機制。夏爾建議港府應成立類似英國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簡稱教資會）的機構，由香港政務系統的成員擔任秘書，以加強控制，並以監管資助計畫為由，管控院校的財政運用及校政發展，俾便配合政府發展社會的目的。[203]

香港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共有 10 名成員，7 名由英國選派到港，包括教資會副秘書長紀福成（Richard Griffiths）及 6 位英國各大學的教授，還有 1 名畢業自牛津大學的西澳洲大學教授、2 名香港本地政商領袖，沒有美國籍或具美國背景的成員。委員會主席為香港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的大班郝禮士（M. A. R Herries, 1923-1995, 1963-1970 年出任怡和洋行主席兼行政總裁）。怡和洋行是英國遠東地區歷史悠久而影響力巨大的老牌英資財團，其主席長年以來享有港府最高行政機關的行政局議員議席。2 名香港華人領袖，安子介（1912-2000）

202 Edward Hale, *The Financing of Universities in Hong Kong, A Report Submitted to His Excellency, the Governor by Sir Edward Hale*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65), p. 1.

203 本段內容出自 Hale, *The Financing of Universities in Hong Kong*, pp. 13-19, 28. 必須說明的是，英國體制中的秘書，並非文書人員，而是高級政務官或首長職級，主導委員會政策釐定及執行的工作。

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是香港殷商，出任委員會副主席，並於 1970 年代出任立法及行政兩局的議員；余叔韶（1922-2019）畢業自牛津大學、並在英國取得執業大律師資格，是首名華人檢控官。委員會中主導經費分配大事的應是紀福成，他於 1966 年 1 月份便抵港展開委員會籌備工作，其他海外委員則於 3 月底才到港，制定香港兩所大學 1967-1970 年共三年度的預算。[204]

以後見之明，港府輕而易舉地透過財政預算管控院校。在 1969 年制訂第二輪的四年度（1970-1974）財政撥款規劃前，教資會成員於當年 3 月 17、18 日親訪中大，與師生代表會談。[205]結果是當局「指示中大必須加強中央功能」，並大幅削減補助經費。教資會此舉意味著要改變中大建校之初奉行的聯邦制度，實行中央集權；大削經費無異於緊掐中大的咽喉，如火如荼進行中的軟體、硬體建設工程隨時胎死腹中。面對港府改制及削資的雙重管控，李卓敏於 1970 年 5 月赴美向各大基金會報告：

> 李校長此行的目的，在向世界各地資助中大發展之機構如福特基金會，卡民基（鋼鐵大王）基金會，嶺南大學基金會及亞洲協會（按：應是亞洲基金會）等等畧述中大最近之發達情況，尤其就中大最近削減經費一事，提出報告。[206]

李卓敏的美國之行，是向捐助中大的機構匯報港府的管治政策，也希望它們繼續捐款。另一方面，李卓敏與校方鑒於教資會的調查結果，在校內推出「資源匯濟」方案，緊縮開支、整頓校政，精簡三院過度重覆的行政人力架構。[207]有關工作隨後再擴大為成立專責工作小組，把中大建校時的「聯邦制」轉變為「統一制」。

由上可見，中大甫成立時，即大舉聘請美國教授出任各級教職員、

---

204 〈大學經費分配委員會訪問本校〉，《中文大學校刊》第 2 卷第 8 期（1966 年 3 月，香港），頁 1。

205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訪問本校〉，《中文大學校刊》第 5 卷第 6 期（1969 年 3 月，香港），頁 1。

206 〈校長月前離港公幹，任務完竣返校視事〉，《中大學生報》第 2 卷第 4 期，1970 年 7 月 15 日，頁 1。

207 張德勝，〈制度的沿革〉，收入吳倫霓霞編，《邁進中的大學》，頁 60-6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課程顧問、評審委員，並且極高比例地邀請美國學者擔任訪問教授，有關經費不論是美國資助或中大承擔，都不可能不引起港府注意。曾有中大聯合書院的畢業生發表對港府管治中大手段的一番見解：「英國雖然在經濟上儘量控制中大，但學術方面，卻有大量美國勢力」，[208]論者因此指出港府對於中大的基本態度是「既要發展，又要控制」；不論中大或港府，都要借助美國的力量來發展中大，但後者同時還要管控美國勢力在中大過度發展。這種見解在當時恐怕已是人所共知的現象，可以說，時人對於英美兩國在中大甚至是香港文教領域的明爭暗鬥了然於胸；而這也可能抵銷了年輕一代對英美兩大勢力的信任度與認同感，認清殖民管治及美援政治的本質。

上述諸種，反映美國在中大的教學、研究及校園文化勢力影響深遠，亦早已成為港府心頭的一根刺。事實上，英美雙方在中大的控制權上，由港府決定補助私專到合併中大，都處於既合作又競爭的狀態。直到 1970 年代，中大的學制從聯邦制變為港府可以高度干預及管控的統一制，其轉變的根本原因與世界局勢變化息息相關。美國在越戰後，經濟及政治實力疲弱，再加上與中國大陸恢復交往，促使冷戰氛圍逐漸緩和。美國減少了對中大的援助與戰略式的互動交流，這可能就是《中大學生報》一則分析文字所說的——「港府亦藉這個機會奪回一些控制權」。本文前述一些靠美援成立的研究中心，也因應時變，「轉移為港府作『研究』」，從昔日承接美國方面研究課題轉變為港府服務的研究機構。[209]

（二）「政府奪權的手法」：冷戰後期港府與中大的人事糾葛

1970 年代中期，時局轉變，美援漸少，但美國的訪問教授仍如過江之鯽般，進出中大校園，新亞書院便有學生注意到全校學生共同修讀的「院際課程」裏，單以 1970 年為例，72 名教授中，除去語文學習科目外，「用美國錢請回來的美國教授有 36 人，用中大錢請回來的有十餘

208 〈校友如何看中大〉，頁 3。

209 馬鞍山，〈從中大發展看香港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頁 7。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人」。[210]「院際課程」設置原意是讓三所書院的學生共同修讀一些基礎學科，但在時人看來，這是為中大「統一」三院而鋪路。另一方面，大學整體財政的縮減，但聘請美國訪問教授的人數並未減少，校方撥付各書院的經費則捉襟見肘，難免引發校內不滿。1973 年，從中大院系行政領導崗位退下來的唐君毅，便公開指斥校方大舉聘請訪問教授，卻未撥發足夠經費發展學術文化：「現在有情形似乎中大方面出版書籍很容易，聘任訪問教授，可十分自由，但在院校要作一些學術教育文化上的事，則非盡九牛二虎之力，自己找錢不可。」[211]

面對中大即將改制以及透過削資以強化港府管控大學，新亞創辦人唐君毅內心忐忑不安。1963 年中大建立以來，三所私專便在大學校政體制下不斷磨合，並且將要遷進新的校園，這使他十分擔心新亞辦學自主性、獨立性的存亡。唐君毅認為雖然新亞曾先後接受蔣介石及美國基金會援助，生存及發展空間並未受限；但在港府的大學體制下，是否仍能夠繼續堅持為中國文化負責任的獨立、自主辦學精神，他對此頗為悲觀。1973 年 6 月 17 日，新亞書院告別農圃道，當天舉辦了「道別會」，唐君毅在演說中不禁興嘆「如今日之新亞尚未加入中文大學，我亦可以贊成不加入」，深刻體現他的矛盾心境。[212]

1973 年，新亞、聯合與崇基都安置在沙田的中大校園；但是不足一年，校方任命新亞書院首名畢業生、時任中大副校長余英時（1930-2021）主持校政改革，把中大由聯邦制改為統一制，掀起了長達數年的改制風波。錢穆、唐君毅、吳俊升、沈亦珍等 9 名新亞書院校董，1977 年公開發表〈新亞書院董事辭職聲明〉，集體辭職，與校方決裂，批評港府出爾反爾、背信棄義，所謂「聯邦制」僅為收編三所辦學特出的私專院校的幌子，在大學集權下，新亞書院及中文大學的教育理想正式幻滅。[213]

---

210 〈校友如何看中大〉，頁 3。

211 唐君毅，〈談新亞與中大的教育理想——答《中大學生報》〉，收入氏著，《唐君毅全集第 16 卷．新亞精神與人文教育．宗教精神與人文學術》，頁 149。

212 唐君毅，〈新亞的過去、現在與將來〉，頁 169。

213 〈新亞書院董事辭職聲明〉，《華僑日報》，1977 年 1 月 3 日，1 張 1 頁。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對於中大的學生而言，各個書院都有人意識到大學改制的重點不在於改革「課程和考試」——這只不過是政治權術——港府企圖透過「中大統一」而「對中大的控制更大」。中大學生會甚至把成立「中文大學」看作是港府奪取專上教育權的過程，由補助私專，將之收編為制度內的一員，到中文大學聯邦制的成立、再到中央集權的統一制，都不過是「政府奪權的手法」。[214]本文從冷戰角度觀之，港英政府此舉更是向美國及數十名私專辦學者奪權的一個環節。這一切，都印證了錢穆直指港府忌憚美援而「意有不安」之說，是一精闢洞見。英國對於美國高度介入香港高等教育事務的顧忌，抵銷了美國對港援助的效能，侷限其影響力的深化發展，也使得美國文化冷戰未如預期般發揮爭奪人心意志的作用。

相比於在中大成立一年即匆匆抽身而退的錢穆，唐君毅苦撐十年，在當局的改制巨輪下所作的種種抵抗，客觀來看亦不過螳臂擋車，致使其退休不數年即鬱鬱而終。他在患癌離世前的數月，因見及中大學生會刊文拆穿當局的「奪權手法」，頗感鼓舞，遂將文章直接寄往當時具社會影響力的《明報月刊》，求該報將文章公諸天下。他痛斥當局「背信食言」、「犯了道德上的罪過」，目的是「以中文大學為誘，以求消滅原有之新亞、崇基之存在與發展」。可見唐君毅晚年對中大當局與港府是如何的憤恨。[215]

至於承港府之命啟動改制的李卓敏以及被任命為改制工作委員會主席的中大副校長兼新亞書院校長余英時，事實上是面對千般艱難，上要應付港英政府的壓力，下要回應校內師生的質詢乃至激烈的批評。他們參與的改革工作，小處說是中大行政效率及資源有效運用，以提高中大國際學術聲譽，大處說是中、英、美大國的冷戰政治博弈促成的結果。從實際情況觀之，縱然他們具備國際學術視野，出於篤信現代大學的管

214 〈中大發展史——政府奪權的手法〉，《明報》第 12 卷第 10 期（1977 年 8 月 18 日，香港），頁 74-78。本文轉刊自唐君毅所寄的《中大學生報》文章，見唐君毅，〈關於《中大發展史》〉，《唐君毅全集第 16 卷．新亞精神與人文教育．宗教精神與人文學術》，頁 179-180。

215 唐君毅，〈關於《中大發展史》〉，頁 179-180。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理效率，誠摯而客觀地為中大釐訂出一套改革方案，但最終不過是冷戰時勢下港府奪權棋局中的一枚棋子。他們在未掌握清楚港府真實意圖或余英時所說的港府「最終要求」的情況下，一年開了逾百次會議，到頭來不但無功而返，更導致他們與新亞元老們的關係決裂。[216]

港府直接否定余英時的溫和改革方案後，1976 年再請富爾敦來港，由他組建一個全部由英國人員組成的委員會，撰寫《香港中文大學調查委員會報告書》，港府再交由立法局據以制定《香港中文大學法案》（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Bill）。這項「法案」於 1976 年 12 月 22 日透過立法程序生效，取代了 1963 年的《香港中文大學條例》，並宣告中文大學自此由聯邦制變為統一制。新法案的出台，意味著政府管控中文大學更加不受制約，相當於立法局通過「大學董事會」直接管理大學，故此一法案被新亞書院的元老批評為「立法局治校」。[217]

待統一制塵埃落定後，港英政府立即於 1977 年推出《高中及專上教育：未來十年內香港在高中及專上教育方面發展計畫》（Senior Secondary and Tertiary Education: A Development Programme for Hong Kong over the Next Decade），俗稱《教育綠皮書》，準備把中文大學四年學制改為英式的三年制。李卓敏與近 3,000 名中大師生集會，一致抗拒港府的學制改革方案，並因此在 1978 年榮休典禮上贏得全體師生高度讚譽。[218]相關抗爭持續至 1989 年 10 月，港府終於用經費撥款與學生名額為由，嚴厲逼令中大妥協。1991 年 4 月，李卓敏辭世，他廣為人紀念的，除了開啟山林之功外，便是堅決維護四年制學制的態度；中大 50 週年金禧校慶紀念專輯上，校方對他的褒辭也著眼於「不懼政府壓力」、「寧死不屈」

216 余英時關於中大改制的自述，可見中文大學歷史系「中大史家」的余英時訪談。參余英時口述，何佩然整理，〈余英時教授治史經驗談〉，2021 年 12 月 16 日檢索，https://www.history.cuhk.edu.hk/internal/01_historians_v1.pdf.

217 Statute 10 The Council,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Bill 1976 Arrangement of Clauses, pp. 10-14, HKRS 618-1-20.

218 〈春風化雨：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黃志新在李校長惜別會上講辭〉，《中文大學校刊》1978 年秋（香港），頁 8。

臺灣人文社會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形象。[219]

港府的改制，據李卓敏的接班人、第二任中大校長馬臨（1925-2017）所說：「政府當年為什麼要強迫中大改制，……目的就是為了延續英國在香港的影響。」[220]我們不妨將之看作港府要在香港管治權交還中國大陸前，全面強化英國的文化霸權與「殖民性」（Coloniality）——制定香港的三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預科及三年大學的學制，與英國本土教育接軌，便於 1997 年前後香港學生前往英國升學，壯大英國教育產業與文化軟實力的影響作用。這無異於說明，這個常被喻為「借來的空間」、「借來的時間」的香港，其 1997 年「大限」，也是英國在冷戰結束之際向美國「奪權」後，再向中國爭奪教育權的「大限」。「四改三」是港英政府高等教育領域的奪權環節最後一道工序，確保英國向大陸移交香港管治權後，仍能在教育產業上建立其「殖民性」。

在中大擾攘了十年的「四改三」改革方案，自 1989 年落實後的 20 年，再於 2009 年聯同其他大學學制一併改革，走上「三改四」的回頭路。或許，恢復舊制，可能也暗含了香港特區政府「去殖民性」的其中一道工序。

結　語

戰後美國對香港專上教育投入大量援助，為私專帶來發展機遇，同時也加快促使數所「流亡大學」合併為香港的第二所大學。本文嘗試從文化冷戰的視域觀察一所大學的成立，別異於一般講求政治正確、思想純正的校史研究，希望為學界提供另一種關於香港社會文化的歷史解讀，藉此反映時局變化如何為香港社會方方面面帶來具體影響。對於香

219 〈「中大五十・人」——創校先賢李卓敏〉，《中大視野》，https://cutv.cpr.cuhk.edu.hk/detail/342?t.

220 王邦華，〈含糊曖昧的中大理念、朝三暮四的大學體制〉，收入中大五十年編輯委員會編，《中大五十年》，頁 22-23。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港歷史上首家獲允用中文教學的大學，其成立帶有清晰時代痕跡與歷史意義，中文大學固然是由港英政府或英國政府主導發展，不論校內高層人事任命還是經常開支費用、校園建設費用，港府當局都要承擔最大的責任；但在冷戰視域下，美國的影響力在中大籌備過程中無孔不入，又反映了香港社會的複雜性。從中大首任校長的聘任、以至人事招聘、系所設置、科研項目、校園建築等經費補助，都可以看到美國的影子。同時，美國也藉著各種文化交流與學生課外活動，為香港的青年學生提供大量接受美國文化價值的機會，延展美國在亞洲的政治輸出與影響力。

不難看見，美國的身影介入中大校內各個領域，致使中大創辦初期的文化使命與政治意涵，在冷戰氛圍下與香港的角色及功能互聯互通，皆是向中國及海外訪客展示「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優劣面的櫥窗。故此，中大從籌辦到成立以來，雖然是在英國倫敦政府、香港總督及其委任的籌備委員會領導下，一步步制定大小政策，但美國政府及其在港基金會，由始至終都有意無意地插手這所新大學「軟體」、「硬體」方方面面的建設與發展。

然而，英國或港英政府也時刻宣示其管治香港的主權與意志。從私專的補助到將其收編成為中大，港府透過法律程序讓第二所大學誕生；不足十年內，港府同樣訴諸法例，將中大由聯邦制一意孤行地轉為單一的權力集中制、統一制，並把私專從美式或大陸時期的四年制學位傳統，單方面地改為英式的三年制。這一切均是透過各種修訂法例條文的手段，再輔以財政管控，逼使中大全校師生屈服。當我們從冷戰的角度觀察，對於港府與英國方面在香港文教或社會管治的心態便有了基本的了解，也對港英政府引以為傲的「法治」文化、對香港所謂的「法治」傳統乃至「核心價值」了然於胸。表面上，香港的高等教育事業具備國際化、先進化的時代特質，但在冷戰視域下，各勢力間的政治考量與文化霸權的爭奪戰，則是無所遁形。

總言之，中大的成立，讓人看見冷戰時期香港高等教育發展乃至近半個世紀以來的大學發展，與美國在戰後高度參與香港事務有緊密的關

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資料庫

係，而港英政府與香港在地辦學者之間對此亦各有方案。中文大學由成立到發展，並不是純粹的教研事業或一座象牙塔，而是不同政治立場、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實踐自身教研理念的地方，甚至是國與國之間的地緣政治因素下實踐政治方案的特殊空間，由此而構成彼此之間不同程度的爭逐與協作。一所現代化的大學，在連串的收編與反收編、控制與反控制，以及種種干涉、掣肘與矛盾中建構出來。

香港中文大學這所於冷戰時期由中、英、美不同政治勢力高度互動下成立的「難民大學」，帶有鮮明的時代色彩，也反映地緣政治的複雜性；我們在探究其歷史發展經過時，很難迴避時局的影響。然而，冷戰視域下的研究，本意絕不在於要對某些現象捕風捉影；事實上，時代巨變之下，各種政治因素介入教育場域，不足為奇。過於政治化的解讀，或許會把歷史問題複雜化，但刻意去政治化或無視各個勢力的政治考量，則會將歷史問題的理解過於簡單化與表面化。

*作者衷心感謝兩位匿名評審專家與編委會給予的細緻、富洞見的修改意見。另外，本文內容曾於以下學術研討會、學術講座以不同形式與學界交流，感謝與會師友惠賜意見，作者一併致謝：東洋文庫超域アジア部門現代中国研究班（国際関係・文化グループ）（2018年度第5回研究会；2019年2月21日）；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opes and Fears in a Divided World: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during the Cold War”（May 4, 2019,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香港理工大學冷戰工作坊（2019年6月1日）；香港大學「香港冷戰微觀學」工作坊（2021年4月17日）；國立臺北大學「第一次港澳研究工作坊——『從臺北看香港：文與史・今與昔』」（2021年11月12日）。

（責任編輯：黃方碩　校對：吳昌峻　廖芷青　陳冠輔）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史料文獻

〈五十載同窗憶良師聚首話當年：1957-1961 年聯合書院校友訪談記〉，《聯合邁進》第 7 期，2010 年 9 月，香港，頁 7-9。

〈香港中文大學成立典禮紀盛〉，《聯合校刊》第 8 期，1963 年 12 月，香港，頁 14。

〈港臺大專學校簡介〉，《大學生活》第 2 卷第 3 期，1956 年 7 月，香港，頁 57-58。

《大公報》，1958、2020，香港。

《工商日報》，1948-1962，香港。

《工商晚報》，1954、1957、1961，香港。

《中大學生報》第 2 卷第 4 期（1970 年 7 月 15 日）、第 4 卷第 8 期（1972 年 8 月 27 日）、第 7 卷第 2 期（1975 年 4 月 20 日）、第 7 卷第 3 期（1975 年 7 月 10 日）、中國周特刊第 1 期（1975 年 10 月），香港。

《中文大學校刊》，第 1 卷第 1 期至第 5 卷第 9 期，1964 年 6 月-1969 年 8 月；1978 秋、1991 春．夏卷，香港。

《文匯報》，1958，香港。

《亞洲基金會香港分會：宗旨與工作》，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NA, CO 1045/917.

《華僑日報》，1947、1957、1960、1977，香港。

《新亞學生報》，1971 年 9 月 9 日、1972 年 4 月 1 日，香港。

王邦華，〈含糊曖昧的中大理念、朝三暮四的大學體制〉，收入中大五十年編輯委員會編，《中大五十年》，頁 22-23。香港：中大五十年編輯委員會，2016。

王厚生，〈論以自助為基礎的美國外交政策〉，《再生》1950 年第 7 期，香港，頁 2。

何仁富、汪麗華編撰，《唐君毅全集第 34 卷．年譜》。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

余英時，《余英時回憶錄》。臺北：允晨文化，2018。

李卓敏，〈大學校刊．題辭〉，收入《中大二十年》，頁 4。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中大二十年檢討活動委員會，1984。

香港中文大學，《開辦的六年：1963-1969——校長報告書》。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69。

凌道揚、錢穆、蔣法賢，〈中文學院聯合會對皮理思教授專論之分析及評論〉（1958 年原刊於《香港高等教育問題之商榷》），收入中大五十年編輯委員會編，《中大五十年》，頁 1-10。香港：中大五十年編輯委員會，2017。

凌道揚，〈扶植本港高等教育之重要〉，收入胡殷編，《香港現行教育法規條例彙編》，頁 43。香港：星島日報，1959。

唐君毅，《唐君毅全集第 16 卷．新亞精神與人文教育．宗教精神與人文學術》。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

唐君毅，〈敬告新亞廿二屆大學部及研究所畢業同學書〉，收入氏著，《唐君毅全集第 16 卷．新亞精神與人文教育．宗教精神與人文學術》，頁 151-154。

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資料庫

唐君毅，〈新亞的過去、現在與將來——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七日新亞道別會演講詞〉，收入氏著，《唐君毅全集第 16 卷·新亞精神與人文教育·宗教精神與人文學術》，頁 155-170。

唐君毅，〈談新亞與中大的教育理想——答《中大學生報》〉，收入氏著，《唐君毅全集第 16 卷·新亞精神與人文教育·宗教精神與人文學術》，頁 148-150。

唐君毅，〈關於《中大發展史》〉，收入氏著，《唐君毅全集第 16 卷·新亞精神與人文教育·宗教精神與人文學術》，頁 179-180。

唐端正編撰，《唐君毅全集第 29 卷·年譜》。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

區慕弘錄，〈吳校長答美國之音記者問〉，《新亞生活》第 9 卷第 12 期，1966 年 12 月，香港，頁 1-2。

陳樹桓，〈香港教育的前途〉，收入胡般編，《香港現行教育法規條例彙編》，頁 46。香港：星島日報，1959。

黃子程、關永圻，〈我們看中文大學〉，收入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編，《中大十年》，頁 8-11。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學術部，1973。

葛量洪著，曾景安譯，《葛量洪回憶錄》。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4。英文版：Grantham, Alexander. *Via Ports: From Hong Kong to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錢　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3。

錢　穆，〈雅禮和新亞雙方合作三年來之回顧與前瞻〉（原刊於 1957 年），收入氏著，《錢賓四全集第 50 冊·新亞遺鐸》，頁 113-119。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

"Marvel, Dr. William, president, Education & World Affairs." In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executive reorganization of the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oper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 Eight-ninth congress, June 27, 28 and July 19 1966*.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7.

"Residential Campus: Governor open new Building of Chung Chi Colleg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ember 24, 1956.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Report o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Cold War Operations,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D-32, April 11, 1952, CIA-RDP80-01065A000500080005-0.

The U.S. Doctrinal Program, PSB D-33/2, Memorandum for the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May 5, 1953, CIA-RDP80R01731R003200050006-0.

Gale Primary Sources U.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

CK 2349110590　CK 2349113667　CK 2349198160　CK 2349396275
CK 2349576377　CK 2349598727

General Correspondencd Files (Confidential), Hong Kong Government Record Service.

HKRS 147-3-3　HKRS 156-1-8340　HKRS 163-3-80　HKRS 618-1-20
HKRS 1402-1-103　HKRS NO. 457, D-S No.3-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Record of British Council: BW 90/558 BW 90/569 BW 90/1599

Record of Colonial Office: CO 1030/ 571 CO 1030/1093 CO 1030/1099
CO 1030/1535 CO 1030/1721 CO 1045/73
CO 1045/819

Record of Foreign Office: FO 371/133512 FO 371/115063

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in Washington, DC.

State Department,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Strength in Hong Kong, and Related Matters, September 27, 1951.

State Department, Mr. Clubb's Memo of January 25 on 250 Qualified Chinese in Hong Kong (Top Secret), January 27, 1951.

State Department, Transmittal of a Proposal to Establish an Anti-Communist, American Directed Intelligence Organization for China (Secret), May 27, 1950.

Substance of Discussions of State-Joint Chiefs of Staff Meeting, State Department (Top Secret), April 4, 1951.

US Army, Hong Kong (Secret), December 18, 1950, FOIA.

Hale, Edward. *The Financing of Universities in Hong Kong, A Report Submitted to His Excellency, the Governor by Sir Edward Hale.*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65.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Box P-57, Hong Kong Program Media Textbooks General, 1956-1957.

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447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held o n June 8, 1960,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9/d334.

Mintues of Meeting of May 18, 1960,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https://www.legco.gov.hk/1960/h600518.pdf.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Report 6007 on U.S. policy toward Hong Kong, May 9, 1960.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Report 6007/1 on U.S. policy toward Hong Kong, June 11, 1960. CK 2349113667.

Paper regarding U.S. policy toward Hong Kong, June 11, 1960, Supersedes NSC 5717.

Priestley, K. E. "Does Hong Kong Need More than One University?" In *Some Problem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Hong Kong: Five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ember 18-22,1957*, pp.10-14.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58.

Records of the President of Harvard University, Nathan Marsh Pusey, 1953-1971, UAI 5. 169 Box 294, 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s.

Szeto, W.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evelopment Plan: Preliminary Report.*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64.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Wells, Herman B. *Being Lucky: Reminiscences & Reflection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二、近人研究

于 群，〈社會科學研究與美國心理冷戰戰略——以「學說宣傳項目」為核心的探討〉，《美國研究》2007 年第 2 期，北京，頁 68-82。

王梅香，〈冷戰時期非政府組織的中介與介入：自由亞洲協會、亞洲基金會的東南亞文化宣傳（1951-1959）〉，《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32 卷第 1 期，2020 年 3 月，臺北，頁 123-158。

江關生，《中共在香港．下卷（1949-2012）》。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12。

吳倫霓霞，〈建校的歷程〉，收入吳倫霓霞編，《邁進中的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三十年》，頁 1-26。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3。

吳倫霓霞、劉義章，〈書院的建立與發展〉，收入聯合校史編輯委員會、吳倫霓霞主編，《明德新民：聯合書院四十年》，頁 3-21。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1996。

周正偉，《中國變局與香港專上教育》。臺北：政大出版社，2020。

翁松燃，〈對外學術交流〉，收入吳倫霓霞主編，《明德新民：聯合書院四十年》，頁 36-41。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1996。

張 楊，〈亞洲基金會：香港中文大學創建背後的美國推手〉，《當代中國史研究》第 22 卷第 2 期，2015 年 3 月，北京，頁 91-102。

張 楊，《冷戰與學術：美國的中國學（1949-197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

張 楊，《文化冷戰：美國的青年領袖項目（1947-1989）》。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

張仲民，《種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閱讀文化與接受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張德勝，〈制度的沿革〉，收入吳倫霓霞編，《邁進中的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三十年》，頁 57-84。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3。

陳方正編，《與中大一同成長：香港中文大學與中國文化研究所圖史 1949-1997》。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0。

陳正茂編著，《50 年代香港第三勢力運動史料蒐秘》。臺北：秀威資訊公司，2011。

陳炳權，〈香港聯合書院乃中文大學之參與〉，收入氏著，《大學教育五十年：陳炳權回憶錄》，頁 564-571。香港：香港南天書業公司，1970。

陳學然、張志翔，〈文化冷戰：美國對香港高校的交流計劃〉，《東亞觀念史集刊》第 17 期，2019 年 12 月，臺北，頁 203-264。

陳學然、張志翔，〈冷戰時期香港「教育條例」修訂與私立專上院校發展（1948-1958）〉，《思與言》第 57 卷第 4 期，2019 年 12 月，臺北，頁 135-198。

陳學然，〈時與變——戰後香港的私專教育事業〉，收入李帆、黃兆強、區志堅主編，《重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訪錢穆》下冊，頁 153-180。臺北：秀威資訊公司，2021。
傅葆石，〈文化冷戰在香港：《中國學生周報》與亞洲基金會，1950-1970（上）〉，《二十一世紀》第 173 期，2019 年 6 月，香港，頁 47-59。
傅葆石，〈文化冷戰在香港：《中國學生周報》與亞洲基金會，1950-1970（下）〉，《二十一世紀》第 174 期，2019 年 8 月，香港，頁 67-82。
黃克武，《顧孟餘的清高》。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
黃庭康，《比較霸權：戰後新加坡及香港的華文學校政治》。臺北：群學出版社，2008。
葉　霖，《在中國的影子下：美國對香港的外交政策 1945-1972》。香港：中華書局，2018。
趙綺娜，〈冷戰與難民援助：美國「援助中國知識人士協會」〉，《歐美研究》第 27 卷第 2 期，1997 年 6 月，臺北，頁 65-108。
羅永生，《思想香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20。
區志堅著，古谷創譯，〈自由なくして生きる道なし——一九五〇年代の香港と『自由陣線』〉，收入中村元哉編，《憲政から見た現代中国》，頁 269-294。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8。
麥志坤著，林立偉譯，《冷戰與香港：英美關係 1949-1957》。香港：中華書局，2018。
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著，曹大鵬譯，《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2。
周愛靈著，羅美嫻譯，《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香港：商務印書館，2010。
Hamilton, Peter E. “Decolonization by Investment: American Social and Financial Capital in Hong Kong.” In *Made in Hong Kong: Transpacific Networks and a New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 pp. 127-15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1.
Hamilton, Peter E. “The Turning Point: Li Choh-ming and Kuashang Strategies at Chinese University.” In *Made in Hong Kong: Transpacific Networks and a New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 pp. 99-12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1.
Laugesen, Amanda. “The Franklin Book Programs, Transla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a Modern Global Publishing Culture, 1952-1968.” *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Chronicle* 71, no. 2 (Winter 2010, Princeton), pp. 168-186.
Laugesen, Amanda. “American Publishers, Books, and the Global Cultural Cold War: Alfred A. Knopf Inc.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1953-1970.”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35, no. 2 (December 2016, Sydney), pp. 19-37.
Mark, Chi-Kwan. *Hong Kong and the Cold War: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4.
Peterson, Glen. “Crisis and Opportunity: The Work of Aid Refuge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RCI) in Hong Kong and Beyond.” In *Hong Kong in the Cold War*, edited by Priscilla Roberts and John M. Carroll, pp. 141-159.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臺灣人文與學術期刊資料庫

Roberts, Priscilla, and John M. Carroll, eds. *Hong Kong in the Cold Wa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Smith, Datus C. Jr. "Ten Years of Franklin Publications." *ALA Bulletin* 57, no. 6 (June 1963, Chicago), pp. 507-512.

Vaux, Tony. "Humanitarian Trends and Dilemmas."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16, no. 3/4 (June 2006, Oxford), pp. 240-254.

Wieters, Heike. "Ever tried—Ever failed? The Short Summer of Cooperation between CARE and the Peace Corps." *International Journal* 70, no. 1 (March 2015, Toronto), pp. 147-158.

三、網路資源

〈「中大五十・人」——創校先賢李卓敏〉，《香港中文大學五十周年》網站（https://www.50.cuhk.edu.hk/zh_tw/cu50thepeople/VCLi），影像見中大校方網上錄像分享平台《中大視野》。2013 年 7 月 19 日發布，2022 年 2 月檢索。https://cutv.cpr.cuhk.edu.hk/detail/342?t.

〈香港中大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將拆解，校方卸除政治隱患〉，《美國之音》，2020 年 12 月 26 日；2021 年 12 月 16 日檢索。https://www.voacantonese.com/a/USC-At-CUHK-To-Be-Closed-Under-Alleged-Political-Pressure20201226/5714182.html.

〈港中大中國研究服務中心面臨「重組」，學者憂「中國研究的參加」將不復存在〉，《英國廣播公司新聞網（BBC 中文）》，2020 年 12 月 25 日；2021 年 12 月 16 日檢索。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5441519.

〈頻曝對港進行政治滲透 港美中心已關閉〉，《香港商報》，2020 年 8 月 30 日；2021 年 12 月檢索。https://hkcd.com/content/2020-08/30/content_1211073.html.

余英時口述，何佩然整理，〈余英時教授治史經驗談〉。2021 年 12 月 16 日檢索。https://www.history.cuhk.edu.hk/internal/01_historians_v1.pdf.

程 翔，〈悼 USC，哀香港〉，《眾新聞》，2021 年 1 月 6 日；約為 2021 年 2 月檢索。因該電子報刊已停辦並刪除網域，故未能提供網址。

Elser, Oliver.〈探尋香港粗野主義建築〉，《M＋雜誌》，2021 年 3 月 10 日；2021 年 12 月 16 日檢索。https://www.mplus.org.hk/tc/magazine/in-search-of-hong-kong-brutalism.

Marvel, William W. "Directions for the Future Federal Programme in Education Designed to Improve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 March 1969. Accessed November 4, 2022. https://files.eric.ed.gov/fulltext/ED040628.pdf.

TZ the Queer，〈中大早期建築興衰史〉。2012 年 2 月 9 日更新；2021 年 12 月 16 日檢索。https://site.douban.com/141457/widget/articles/6785224/article/1665200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istorical Inquiry 70 (Dec. 2022), pp.167-244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I: 10.6253/ntuhistory.202212_(70).0004

Cold War Hong Kong and the Founding of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an, Hok-Yin*

Abstract

The British-Hong Kong government merged three Chinese-language private post-secondary colleges to for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UHK), not only in response to social demand, but to strengthen social governance and the need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Granted that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domina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CUHK, American foundations exerted a strong influence from the conception, organization, and naming of this new university, to the recruitment of presidents, institutional setup, personnel hiring, and even the layout of the campus buildings. This deep involvement was inevitable since the three colleges had received United States (US) funding since their establishmen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President Li Choh-ming, the disciplines of the new university were set-up to emphasize establishing a local economic construction model, while continuing to strengthen Hong Kong's internationalization as US-centric.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the US consciously avoided military conflict with China in Hong Kong, but in order to contain the communist ideology, the US deliberately sought to promote the pro-Western values of the Cultural Cold War in culture and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S Cold War strategy and US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Histor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83 Tat Chee Avenue, Kowloon Tong, Kowloon, Hong Kong;
E-mail: hokychan@cityu.edu.hk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policy towards China, CUHK was to be molded as a cultural beacon that accentuated the contrasts between the democratic world and Communist China. Erstwhile Hong Kong was also developed an outpost for spying on Communist China and became a US cultural Cold War and intelligence center, giving rise a complex socio-political atmosphere there. The discussion elucidate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post-war Hong Kong's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offers an appreciation of the role of the U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Hong Kong's higher education.

Keyword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UHK), Cold War Hong Kong, American Foundation, private post-secondary institutio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